

LIFE MAGAZINE **生活** **THE TWO GENERATIONS OF 90S** 来来今路 **SEEK THE FUTURE** 5/6月 2023年 总198期 HK\$120 RMB¥100

总198期 | 5/6月 2023年 | HK \$120 | RMB ¥100

LIFEMAGAZINE

生活

月刊

BORN IN 1890s & 1990s

THE TWO GENERATIONS OF 90s

两代90后的世纪遥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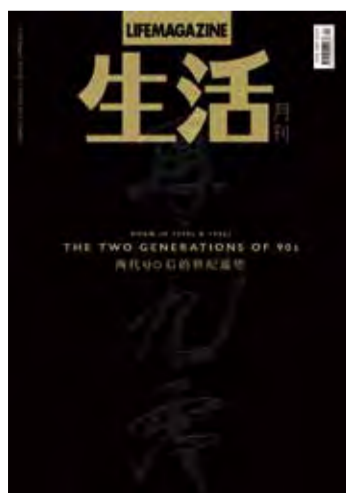
再

九

天



BORN IN 1890s & 1990s
THE TWO GENERATIONS OF 90s
两代90后的世纪遥望



封面书法作品：王冬龄



008 90后的独立评论
收获不必在我

一份由“九零后”所办的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刊《独立评论》存世5年，共出版244期，发表文章1309篇，发行量一度高达1.3万份，却因抗战而落幕。那代人的杂志梦，背后藏匿着深重的家国情怀。



042 聆听她，张望历史

杨苡的口述是少数留存至今的那代人对于一段历史的见证。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聆听了她生动明快的、充满细节的讲述，把重复的、断续的叙事连成为连贯的、忠于她口吻的故事。她带领我们张望那一代人命运的沉浮，烛照历史的曲折幽微。

050 南湖畔，幻想底乘客



092 九零后翠帘师
编织传统与未来的“结界”

京都老字号“翠帘平”那种对于翠帘师的技艺传承，如今传到了两位年轻的八零后与九零后身上，这个需要两人共同完成的技艺，也许只有息息相通的兄弟才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102 时间的交汇点



056 凝固之乐 初试啼声

建筑师，和许多创作者一样，是游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些人。他们一边在图纸之上挥洒灵感和热情，一边攀爬在现实的陡坡之上，寻求缝隙，呼吸、表达和创造。我们邀请三位建筑师，北京的鲁坤、成都的张唐和江门的李继津，看他们通过点点滴滴的营造和修缮，改变了一片土地的色彩和天际线，渗透入真实的生活。面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所涌现的需求和议题，这些90后建筑师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大地诗吟 The Chanting Earth Vol.12

106 赶时间的人

送外卖的人穿越在街巷中，没有人比他们对于一个城市眼皮底下的面貌更了如指掌，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晰地意识到每分每秒都能以金钱衡量。

114 开始，纪录片从何开始？

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李维第一次到了一个一年365天都吃土豆的地方，来自所谓现代社会的自己，在进入一个好像“前现代”的环境中，去看到一些人的生存状况，立刻涌起的强烈地拍摄欲望，想要表达，想要通过那些人把他想说的都说出来。



- 076 走出童年的房间
- 084 生活本是一场穿越
- 088 遥望，也是回望



122 1990 纯真物件



大地诗吟 The Chanting Earth Vol.12

132 离开的，归来的



150 少女无畏



158 真探

- 164 90年代生活的记忆卡
- 168 乡关何处？无处不在的眷村

发现亚洲艺术精神系列 Vol.03

176 飞扬穿梭，别有洞天

王梓全的飞行器表演也许是很多人知道他与他记住他的起因，但他也从未刻意寻求任何热点。从雕塑、影像到表演，关于身体的不一样视角的讨论一直贯穿于他的创造之中。新与旧、古老与未来的连接，再次回应我们探讨浮雕时所提出的工作逻辑。时间仿佛成为了一种曲线，在螺旋中，向上向前。

致力于邀请最优秀的作家、摄影师、艺术家一起参与创作

生命的教育 生活的禅意



The SOPA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2021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第180期《境转新生》，2020年11月



2020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第163期《浪漫中国》，2019年6月



2019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第157期《赤子之心》，2018年12月



2018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142期《城市生长》，2017年9月



2017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127期《旅程日常》，2016年6月



2016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112期《现代先声》，2015年3月



2014 年度卓越生活时尚报道奖
Excellence in Lifestyle Feature Writing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90、91、92、97期《茶之路》别册



2013 年度卓越专题写作奖
Excellence in Feature Writing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74期《国宝之路》，2012年1月



2013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76期《仰望星空》，2012年3月



2013 年度卓越专题摄影金奖
Excellence in Feature Photography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79期别册《九歌肖像》，2012年6月



2012 年度卓越专题摄影金奖
Excellence in Feature Photography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70期，冯君蓝《微尘圣像》，2011年9月



2011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第55期《人生博物馆》，2010年6月



2011 年度卓越专题摄影奖
Excellence in Feature Photography
第51期《我们不是一家人》，2010年2月



2011 年度特殊封面设计奖
Excellence in Special Coverage
第41期别册《新青年》，2009年4月



2010 年度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Design
第40期《人间喜剧》，2009年3月



2009 年度卓越专题摄影金奖
Excellence in Feature Photography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35期《长江家书》，2008年10月



2008 年度卓越特别报道金奖
Excellence in Special Issue/Special Section Award for Excellence
第24期别册《重走梁思成之路》，2007年11月



2008 年度卓越封面设计奖、卓越设计奖
Excellence in Magazine Front Cover Design and Design
第20期《沿海中国》，2007年7月

于2005年创刊的《生活月刊》，从2007年起参与SOPA评选，14年间收获20座SOPA奖杯——12次获设计类别奖项，4次获摄影类别奖项，4次获写作报道类奖项。

关于SOPA: 亚洲出版业协会颁发的亚洲卓越新闻奖(The SOPA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旨在表彰亚太地区的高水平媒体作品, 推动亚洲出版业的专业水准与国际合作, 包括《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路透社》等媒体曾获此殊荣。奖项评委会由逾百位来自全球各地著名学者、编辑、记者、专栏作家、摄影师等组成, 是亚洲地区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大奖。



ORGANIZER

主管单位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黑龙江生活月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CHAIRMAN/GENERAL EDITOR
社长/总编辑
乔靓 QIAO LIANG

CO-ORGANIZER
广告代理
广州现代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MODERN MEDIA GROUP

EDITORIAL PHOTOGRAPHY & ART DEPARTMENT

CREATIVE DIRECTOR & CHIEF EDITOR
创意总监及主编
令狐磊 ROCKY LIANG

FASHION DIRECTOR 时装总监
高迟 GAO CHI

EDITORIAL DIRECTOR 编辑部主任
陈爽 SONG

FEATURE EDITOR 专题编辑
周亦鸣 ZHOU YIMING

GUEST FEATURE DIRECTOR 特邀专题总监
徐今今 JINJIN XU

CONTRIBUTING EDITOR 特约编辑
美帆 SAUSER MIHO(东京)
尔尼 ERNI(巴黎)
林追追 LIN ZHUZHUI(成都)

PRODUCTION EDITOR 流程编辑
鲍雪 CANDICE

CREATIVE CONSULTANT 创意顾问
何思佳 TAKI HE

CONTRIBUTING DESIGNER 特约平面设计
刘小凉 RYU

SOCIAL MEDIA EDITOR 新媒体编辑
倪乐航 NI YUEHANG

SENIOR RETOUCHER 高级修图师
关科科 KEKE GUAN

2023 年 5/6 月刊
邮发代号 14-234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5-0493
国内统一刊号 CN23-1340/G0
广告许可证 2301004010076
发行单位 广州现代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售
出版日期 2023年6月20日

MODERN MEDIA 现代资讯传播有限公司
E-MAIL 邮箱: CHINALIFEMAGAZINE@GMAIL.COM 客服热线: 4006 5032 06 客服传真: (8610) 6561 082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两代“九零后” 谁在敲击时代之音

令狐磊

翻开这期杂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由上一代“90后”办的传播思想杂志——《独立评论》，然后当你得知那些影响了整个国家在20世纪进程的人：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赵元任、竺可桢、钱穆、茅盾、冯友兰、蒋廷黻、郁达夫、闻一多、潘光旦等人，均是上一代“九零后”。

不知道是身处跨越世纪的造化，还是国家在变革之际的“国运”使然，天神下凡，群星璀璨。诚如斯蒂芬·茨威格所写：“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某种程度上，中国在1890年间诞生的“九零后”天才们如群体般涌现，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九零后现象”，两次世界大战、工业化飞速发展、全球电报电话等科技发明的突破，让他们的人生保持着改变时代的勇敢者姿态亦或是一种警醒者姿态。

当然，如今我们提起“九零后”更多意味着是我们对于那些生于1990年代的人的统称，这新一代的“九零后”也是时代的娇子——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他们在数字科技的普及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成长，并具有与前几代人不同的特点和经历。他们与被称为独生子女最早一代的“80后”相比，无论是技术环境（网络年代原生人）、教育环境（教育现代改革的成果）还是整个社会带来的家庭经济条件的跃升。

我们关注到属于这一代正在敲击出的时代之音，从文学、电影、艺术、摄影、音乐、设计、传统工艺乃至民俗文化遗产等领域，我们与这一时代的杰出年轻创造者以及这一代的平凡人聊天，希望能勾勒出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作者的理想容貌和作为身处变革节点年代带给每个人的。我们也可以从当年的每一代的成长和面孔生成中得到一些启发，比如凯鲁亚克与他描述的“垮掉的一代”，日本“团块世代”以及他们的“挪威的森林”，还有我们中国本身就存在着的上一代“九零后现象”。我们试图通过这些真挚的访谈，探索属于这一代正在生成中的生命共性和价值观。这一代人对于时代和未来的贡献，我们需要交给时间来检验。但目前我们可以明晰看到的是，当他们处于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时代时，他们之中一部分人也许或多或少都有海外学习与生活经验，也有一部分人与海外的世界存在着隔离状态。他们对于未来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必将能敲下属于他们独立精神的时代之音。

如何能保持独立的精神？上一代的“九零后”胡适先生说，我们要“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撇开成见，看看事实”。闻一多先生说“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时他不免盲目，但在非常时期他永远是不盲目的。”那时候的九零后，明澈锐利、入木三分的声音响彻大江南北，这个在我们面对自身的文化发展上尤其重要。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性是循环往复中“自得其乐”。要知道，多被文化人尊称为英国文豪的查尔斯·狄更斯曾在参观了1851年的英国首届世界博览会后，不无嘲讽地写道：“想一想景德镇制造精美绝伦的茶具所使用的材料吧……再看看这个华夏帝国辛辛苦苦雕刻出的象牙球，球中有球，一层套一层，几千年没有什么改进，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西人所无法鉴赏的用处，也许正是值得反思我们当时在工业革命年代的全面掉队。

如这期的标题“再九零”，再一次，我们迎来了一代“九零后生人”，他们正在开始对这个时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期，也许更多地适合在十年后甚至是二十年后阅读。我能相信，这里面提及的年轻人会不负这个时代给予他们的机遇，我们能做出比上一代人更多的“新用处”吧？如何能做到不负今日，同样地，可以读读上一代的“九零后”梁启超先生的名言：“今日之实，譬犹开卷，革旧兴智，求索修远，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明明德，止于至善。”



当代艺术家王冬龄特别为本刊书写的作品《再九零》



九零后的

獨立評論

INDEPENDENT
REVIEW

『收获不必在我』

撰文 张泉

创办《独立评论》时，「九零后」胡适已经年过四十，1932年9月，他与丁文江（生于1887年）、蒋廷黻（生于1895年）等人联合创立这本刊物。「九一八事变」后，《独立评论》试图续接《新青年》和《努力周报》未竟的使命。《独立评论》兼有清华和北大的基因，参与者以科学和社会科学见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更现代，行事风格也更加入世，希望「用公心思考」，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寻找出路。

一份由「九零后」所办的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刊《独立评论》存世6年，共出版24期，发表文章139篇，发行量一度高达13万份，却因抗战而落幕。那代人的杂志梦，背后藏匿着深重的家国情怀。

I·重拾报刊梦

II·精神领袖的命运轮回

III·独立的精神

IV·学者从政

V·「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
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
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胡适

◇ I·重拾报刊梦 ◇

一、庚午年的尾音

1932年没有除夕。

羊年将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径直走到尽头，心急火燎，竟像是落荒而逃。

过去的一年，也委实不堪。“九·一八”以来短短几个月间，日军几乎兵不血刃，中国就将东三省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让。

1月28日是腊月二十一，距离北方的“小年”还有两天，性急的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往嘴里塞满麦芽糖和江米糖，满街的春联、年画、蜜供、水仙花、历书、松枝、薏仁米、年糕，五彩绚烂，这动荡黯淡的年关，终于有了些许暖意。然而，学人们依然心冷如冰。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在几个朋友的聚餐会上，胡适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草拟了一份办周报的计划，在清华大学主持历史系的蒋廷黻则列出办刊的三项大政方针：内政、外交和人生观，希望探讨现实问题，为未来寻找出路。

对于这群任教于清华、北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创办一本批评时事的周刊，实在是得心应手。常在清华俱乐部聚会的朋友们——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与陈衡哲夫妇、陶孟和、张奚若、吴宪、李四光、唐钺等人——大多有过办报刊的经验。然而，过去几个月里，尽管蒋廷黻一次次提议创办新刊，却又一次次遭到集体反对。正因为大家都办过报刊，所以深知其间的艰险：资金、人力、稿源、发行……诸多环节都需要考量，更何况，他们还要面对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现实困扰。陶孟和就警告大家不要继续冒险，毕竟，从前办《新青年》和《努力周报》时挫折重重，让他心有余悸。胡适对此更是感同身受，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参与的几份报刊，几乎都中途夭折。

胡适一直梦想能创办一本中国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那是他留学美国时最钟爱的刊物。“五四”之后，《新青年》逐渐分崩离析，旧友离散甚至反目，当鲁迅哀叹北京已如一片“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时，胡适等人却在默默筹划，准备再办一份持独立立场的刊物，续接《新青年》未竟的使命，1921年5月，一些留在北京的朋友终于重新聚拢，胡适、丁文江、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等人成立“努力会”，希望“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一年后，《努力周报》创刊，胡适将它视为“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可惜，仅仅不到一年半，政局愈发混乱，曹锟贿选总统的消息更让他们无比失望，《努力周报》最终停刊。此后，胡适一直宣称“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它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丁文江也屡次鼓励胡适筹备复刊，或者办一份《新努力周报》，甚至还催他寄些稿纸来，自己愿意马上写文章，可惜，《努力周报》终究没能复刊。胡适和朋友们转而为《现代评论》撰稿，但这本刊物也只存活了四年。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翌年，又效仿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立“平社”，希望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出发，讨论“中国问题”。然而，徐志摩遭遇空难去世后，《新月》疲态尽显，而种种变更更让人心寒。“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因为《新月》刊登了一篇罗隆基批评约法的文章，北平市公安局竟派人冲进新月书店，查抄了《新月》第二卷第八期全部杂志，还逮捕了两名店员。胡适托关系给公安局局长写信，才把店员保释出来。《新月》虽然暂时得以保全，但空气愈发令人窒息。十几年来，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时局让他们如鲠在喉，又意兴阑珊。

所幸，蒋廷黻不厌其烦的提议，终于唤起了丁文江的热忱。丁文江是地质学家，更是一位意见领袖，被朋友们喊作“丁大哥”。他呼吁大家不妨一试，但他提出，为表决心，必须集资，各自捐款，惟其如此才能把办刊物真正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这便又撩动起胡适的报刊梦，怀着犹疑与渴望，再度跃跃欲试。

年末这一餐，就是想讨论这份新刊的架构，不过，对于内政、外交与人生观的具体设定，大家却争执不下。胡适有约在先，不得不提前离场，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悄然表明了态度，他写道，蒋廷黻的规划并不高明。这份襁褓中的刊物，屡遭延宕，似乎又将不了了之。

这场聚会散场几个小时后，千里之外响起隆隆炮火，日本海军陆战队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慨然反击。淞沪抗战爆发，中国人在烽烟中辞旧迎新，战火几乎蔓延了整个正月。庚午年的灾难与窘迫，仿佛无穷无尽，拖着悲怆的尾音和余响，燎向壬申年。

二、十分之一的意兴

“总觉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怎么好？”几个月后，胡适在给丁文江的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大家最终同意创办新刊，胡适却对它的前途又生出诸多疑虑，甚至有些兴味索然。所幸，这寥寥“十分之一”的“意兴”，还是支撑着他们在1932年5月22日推出了《独立评论》创刊号。胡适担任主编，蒋廷黻、丁文江协助编务，其他人负责撰文。常来参与聚会的北大法学院院长、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当时正担任北平国民党党部委员，他出面帮《独立评论》办好了登记与备案手续。丁文江则介绍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竹垚生加入，统管财务，以便杂志能良性运转。依托庞杂而深厚的社会关系，他们轻松解决了创刊要面对的基本难题。

就像当初组建中国科学社和创办《努力周报》一样，《独立评论》的早期资金也来自创办者捐款集资，社员们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用于出版，撰文则不收稿费。早期捐款从180元到500多元不等，《独立评论》由此艰难起步。为了坚守“独立”的立场，他们甚至不肯刊登广告，因为广告往往来自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形同接受政府补贴，难免会对刊物有所影响。

以《独立评论》为圆心，聚集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社团。他们时常聚餐，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有时也会讨论刊物的运作状况。《独立评论》社社员始终不多，在胡适的记忆里，“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二三人”，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甚至简单得有些草率——“人数的限制是为了聚餐谈话的便利”。

《独立评论》社以胡适为核心，前期社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吴宪、周炳琳、顾振、竹垚生，后来又陆续补充了吴景超、周诒春、张奚若、何廉、张忠绂、陈之迈、陈岱孙、顾毓琇、陈受颐等人。新社员能否入社，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补充社员入社需要全社公开表决，只要有一名社员对提名人选持反对意见，被提名者就不能加入。

这群学人大多从英美留学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有的人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有的人则被达尔文深深蛊惑。相比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与北大“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独立评论》则兼有清华和北大的基因，而更以清华为主。参与者的专业领域大多脱离了文学和语言学的范畴，而以科学和社会科学见长，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都更现代，行事风格也更加入世。核心成员大都是多年的朋友，也一直是公共舆论界的活跃人物，有几位还担任中基会董事，共同掌控着民国时代为数不多的重要学术基金资源。

《独立评论》有社员和职员之分。杂志创刊后，胡适的同乡、原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曾协助校对，具体经营则由20岁的北大学生黎昔非负责。这份刊物有稳定的社址，是大家集资在地安门内北月牙二号的民居租下的几间房。社员们平常聚会的地点，则并不固定，往往在清华俱乐部或者社员家中。种种情形都表明，《独立评论》社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团，它的性质介于俱乐部与社团之间。它没有明确的纲领，社员们在理念上甚至也并不一致。办刊之初，胡适就公开宣称：“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种态度正是这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的立场，就像当年创办《新月》时一样，他们也“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事实上，这种对不一致的尊重与推崇，却正是他们的一致之处。

十几年前，《新青年》集结的作者群被认为拥有政治倾向，《独立评论》也难逃类似的界定。尽管《独立评论》社是一个规模极小的社群，组织松散，但在外界看来，却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人们称他们为“独立派”，甚至有人揣测，他们在谋划组建一个新的政党。

从私人聚会到公共空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在近代公共生活中，报刊是连接知识群体与公众的纽带，其自身更形成独特的磁场。《独立评论》把社员们私下讨论的问题公开化，在更大范围内发声，凝聚起知识界的声音，并试图引发社会关注。它的读者主要是大学生、公务员和开明商人，一些年轻军官也对它很感兴趣。多年后，蒋廷黻发现，许多人之所以认识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是因为《独立评论》。在刊物的“加持”下，原本规模很小的社群，仿佛变成了一个能影响时代进程的公共平台。这种迷人的假象，正是报刊赋予知识群体的独特力量。







◇ II · 精神领袖的命运轮回 ◇

一、“叛国者”胡适

创办《独立评论》时，“九零后”胡适已经年过四十。在中国人看来，四十是不惑之年，然而，时代的干戈仍在夜以继日催生着他的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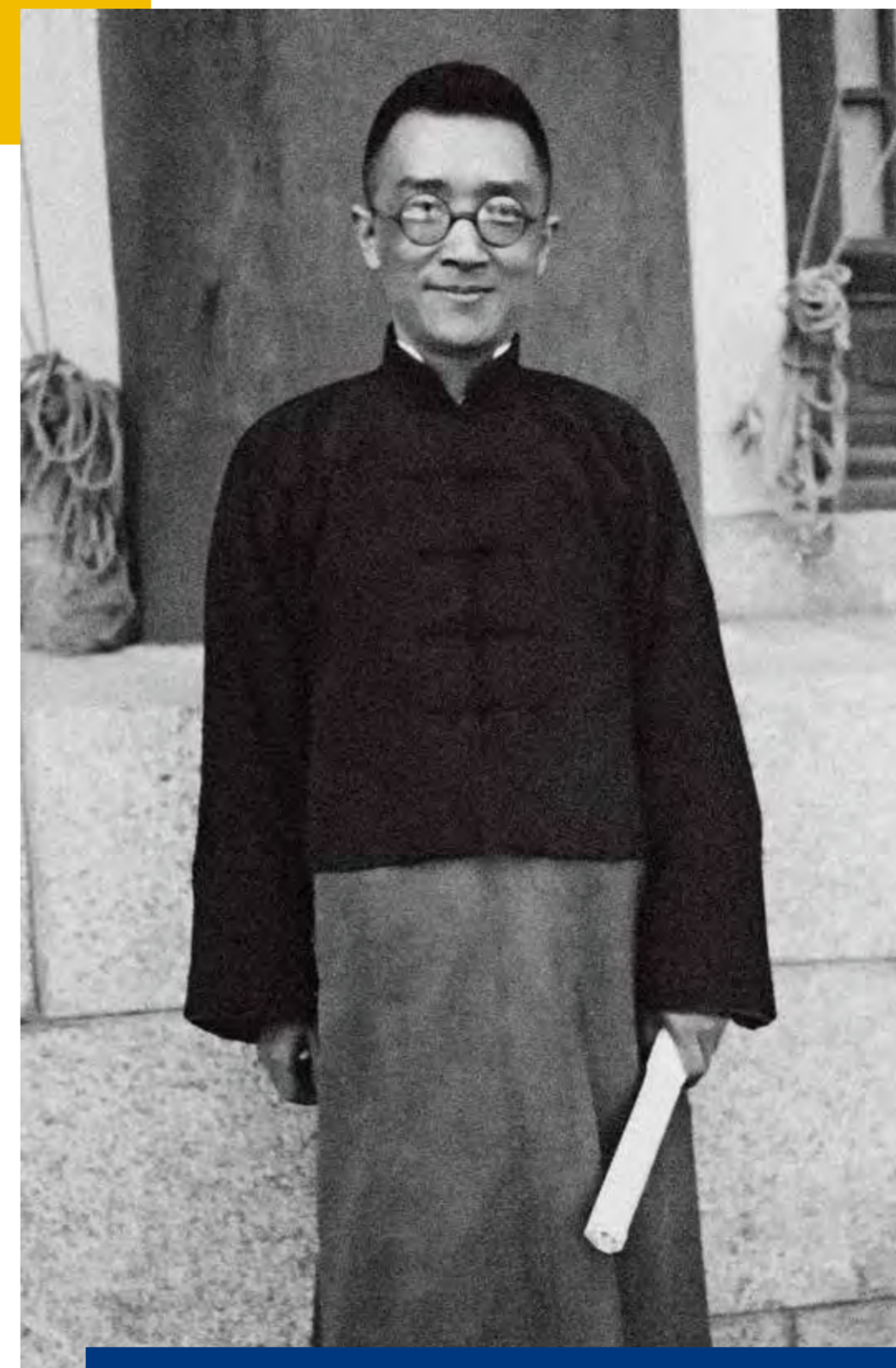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变者不仅在军事、科技、制度、生活，最根本的改变是思维方式。胡适留学美国时，曾比较分析留学生与传教士，认为他们都带来“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他相信，“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胡适这代人留学的初衷，是为了获取知识以寻求救国之道，而独立人格的养成则是那段岁月给予他们的无形馈赠。在学习新知的过程中，他们对探究真相保持着天然的兴趣，生活经历则让他们对权威产生了本能的警惕与怀疑。这一切都促成了独立精神的发育。

回到中国后，他们又逢上一个正在发育中的多元社会。商业的发达、出版业的兴起、大学与各类研究机构的建立，让这一代知识群体迅速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从而能保持自身的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他们可以到大学任教，也可以为报刊撰文，指点江山。在大学里，他们面对的只是一小群年轻人；在报刊上，他们的声音却被放大到成千上万倍。与其说他们在传播新知，毋宁说更是在帮助国人养成独立精神，以笔为刻刀，重塑一代新国民，由此，公共空间得以曲折地拓展。

但他们面前的路并不平坦。在承袭千年的传统世界里，循规蹈矩才是美德，质疑从来都不是一种真正被鼓励与提倡的行为。这一代人因独立精神而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也注定将为此付出代价。

胡适回国时踌躇满志，在演讲时朗诵荷马的诗句，“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他随即给观众们翻译道：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在公开场合表态，终究要柔和些，而他在日记中的表述则更加决绝，“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那时他声名鹊起，被无数年轻人追捧，就连逊帝溥仪都对他心生好奇，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沮丧地意识到，“我们”带着独立精神的火种回来，试图照亮长夜一隅，“你们”却担心引发燎原大火，不敢接纳，甚至百般阻挠。“我们”所企图的，只是“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而“你们”所顾虑和抵制的，正是独立精神本身。

为了维系独立精神，他决定与政治保持距离，“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新青年》后期变调，他致信陈独秀，继续强调：“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他希望刊物能保持相对的公共性与独立性，不至染上过于鲜明的色彩，但他当然知道，这或许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他其实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知识人尴尬的处境，“我们本来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种种荒诞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法与政治保持优雅的距离。1922年5月，他连夜写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召集了蔡元培、王宠惠、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16位知识界领袖联合署名发布。那是他第一次写政论，写得非常吃力，但他自认是责任所在，别无选择。1923年初，因教育总长“献媚军阀”，践踏法律，蔡元培愤然辞任北大校长，胡适更激烈地写道，“在变态的社会之中……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膀上。”既然不想坐以待毙，就只能起而论道，不放弃“言论的冲动”，通过手中的笔，来对抗权力的侵袭，争取个体的自由，甚至直接“干预政治主持正谊”。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 HOMERIC EPIC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工作，
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丁文江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从北洋政府进展到国民政府，政局并无改观，反而让人愈发失望。因为“言论的冲动”，胡适甚至一度变成了“反革命”。1928年，在南京召开的大学委员会上，胡适原本很敬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把这顶帽子扣在胡适头上。会上讨论将北大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李煜瀛为校长，胡适极力反对，吴稚晖起身大骂胡适是“反革命”。后来，《申报》又刊登了国民党对胡适的攻击，认为他“主编《新月》杂志，方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坊间一度传闻，当局已忍无可忍，准备派出特务暗杀。这些攻击与威胁，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胡适的处境，直接将标题定为“叛国者胡适”（Traitor Hu）。

从“不干政治”，“不谈政治”到“干预政治”，胡适的思想裂变看似迅疾，实则犹疑而痛苦，如同“哈姆雷特之问”，有为与不为，有感与不惑，虽只在一念之间，却终被时代左右。而胡适回国十多年的遭遇，其实也足以预言《独立评论》的前途——或许起始顺利，却注定举步维艰，要遭受各种猜忌与抨击。在知识群体的生活中，政治一直是不速之客。

二、“好人”丁文江

如果说胡适是《独立评论》社的一面精神旗帜，那么，“丁大哥”丁文江则是这个小小社群中强有力的旗手，对于政治的无常，他的感受比旁人更加深切。

他仿佛是天生的探险家。15岁时，这个极少出远门的县城少年不顾家族反对，举债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尽管他几乎不通英语，旅费也捉襟见肘，却还是说服了两个朋友，结伴前往欧洲。途经槟榔屿，他们礼节性地拜访了康有为，依靠康有为赠送的10个金镑，才终于完成了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航程。到英国后依然走投无路，他险些去船坞打工，所幸，一位医生帮助他留下来，他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经过专业的科学训练，冒险精神终于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国后，他满怀憧憬准备探索崇山与疾流。1913年，年仅26岁的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前者被视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后者更是硕果累累，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出人意料的是，8年后，为了承担家族责任，缓解经济压力，他决定投身实业，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又过了5年，他突然选择从政，在军阀孙传芳治下，出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丁文江一变再变，自有他的苦衷，却也不乏天真的念头。

他的专业领域距离政治极为遥远，但他从政并非突发奇想。他一直以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况，给自己起的笔名就叫“宗淹”。他常宣称历史是由“少数人”缔造的，“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他也从不讳言“少数人”应当主动肩负使命，“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他曾与胡适一道积极地鼓吹“好人”应该做官，应当建立“好人政府”，因为“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

他自己就是典型的“好人”。1913年创办地质研究所后，为了邀请章鸿钊加入，他竟独自带着行李，悄然离开北京，千里迢迢去云南调查地质，把所长的职位留给章鸿钊。他为人处世一向古道热肠，时常竭尽全力帮助朋友，扶持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居功，有公心，“好人”参政无疑是国家的福音，只是，道德与知识能否净化政治，“好人”能否真正拯救危亡，却有待商榷。

1922年，胡适写下《我们的政治主张》时，丁文江也曾联合署名，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们极力提倡的“好人政府”居然就变成现实。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新内阁，10名阁员中有8人曾留学欧美或日本，回国后也都有过不俗的从政经验，因此被朋友们寄予厚望。可惜，军阀派系林立，身处夹缝中的“好人内阁”只存在了两个多月便告夭折。纵然书生们了解现代政治理论，也熟稔传统的治世哲学，但纸上得来的滔滔谋略，终究敌不过现实世界的博弈与倾轧。

面对残局，丁文江不得不承认，“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到头来，自己所做的事业只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地基的。”从前的自我期许，逐渐变成自嘲，他把一切归咎于生不逢时，将自己称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但他总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笔名“宗淹”，于是，当孙传芳向他抛出橄榄枝，当一个改造社会的机会隐约出现时，他终究难以拒绝。

事实上，他对许多军阀报以同情之期望，愿意相信他们有道德底线，他曾告诉蒋廷黻：“你不懂军人……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国家对国家有贡献。”他对孙传芳就颇有好感，认为孙传芳是一个开明的军人，因此欣然答应出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希望能抵抗奉系军阀南侵，为国家做些实际的工作。任职的8个月间，丁文江重整上海市政建设，还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可惜，他投身政治的时刻极不恰当。北伐军正魔师而来，孙传芳无法抵挡，竟转而向张作霖乞援。这直接违背了丁文江的初衷，他为此愤然辞职，但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还是让他饱受诟病。北伐胜利后，丁文江也沦为“反革命”，一度遭到通缉。他只好重新回归地质研究，开始整理《徐霞客游记》并为徐霞客编撰年谱，但他仍不死心，不肯彻底放弃政治上的努力，勉励自己“决不悲观，决不怕难——也决不怕死。”

梁启超去世后，为梁启超编撰年谱的工作也由丁文江承担下来。他曾随梁启超考察欧洲，亲眼目睹梁氏在政坛上屡败屡战，而经过全面搜集、整理梁氏的档案资料，他也比旁人更能理解这位活跃于民国政坛、文坛、舆论界和教育界的思想巨擘。他早年就劝梁启超“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多年后依然坚持这一判断。他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和民国的许多书生一样，当丁文江用复杂的口吻臧否前辈的一小时，却并不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也在踏入同一条命运之河，一次次重蹈覆辙。



1935年·傅斯年前往安阳视察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情形。
右一为梁思永，右二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图片由史语所提供)



1930年鷺峰地震研究室前合影·左一为谢家荣·左二为章鸿钊·右一为李善邦·右二为翁文灏



1937年·被轰炸的上海闸北·摄影师：Andersson (瑞典东亚博物馆藏)



淞沪会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一、民主与救亡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胡适为《独立评论》作发刊词时，政论文已经写得得心应手。此时，“五四”精神似乎渐被时代稀释，这群“五四”时代的遗民，却仍怀着无比的热忱，试图再度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播下独立精神的种子。

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比发刊词尖锐得多，他们将矛头直指国民党“训政”，胡适写道：“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畏惧人民参政，执政而不能做点治国利民的事业，号称训政而所行所为都不足为训——那么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蒋廷黻则做了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类比，“所谓国民党训政，论其成绩，尚不及宣统年间满清的预备立宪。”通过猛烈批评当政，初生的《独立评论》祭起大旗。

对中日关系走向的讨论，是创刊号的另一个重心。《独立评论》创刊时，“淞沪抗战”已经结束，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各界积极响应，这些现实都让知识界深受鼓舞，胡适将这次抵抗比作“为我们这个老病民族注射了一针返老还童的灵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九十年中，不曾有过这样振衰起懦的兴奋剂”。可惜，这“返老还童的灵药”并不足以改变大局，而“兴奋剂”也注定只能维持短暂的欢娱，在丁文江看来，日本犬养毅内阁遇刺事件已经预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不论何人来继犬养组阁，军人的法西斯蒂运动不久一定要成功的。”他还发现，更可怕的是，这种激进狂躁的情绪正在全日本弥漫，“日本大多数青年，都赞成军阀，厌恶政党。军人专政和法西斯蒂主义渐渐得到日本社会的同情”，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信号。

创刊号清晰地表明了《独立评论》的两个主要诉求：民主与救亡，这也成为这本刊物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从《新青年》到《独立评论》，他们面对的是更为复杂、险峻的时局，当年“巴黎和会”所失的，是一省的归属，一国的尊严，“九一八”引发的却是亡国的先兆；新文化运动时，矛盾的焦点主要还是新旧文化的更迭，此时则必须直面政治体制的变革。时代的夹缝越收越紧，迫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亲身投入政治实践，以期改变纸上谈兵的困境。从前进行文化革新与文学实践，他们手到擒来，此时与此后的世界却逐渐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畴，但他们也只能向前，甚至无暇考虑，这种选择带来的结果是否会适得其反。

二、鸚鵡与乌鸦

以“独立”为名的杂志，应当如何保持“独立的精神”？在胡适看来，需要做到两点——“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前者让知识群体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做出冷静的判断；后者则使他们放弃傲慢与偏见，更客观地看待问题。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精神动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获得公众响应的，有时并不是客观冷静的声音。人们对“成见”的迷信，远超过对“事实”的向往。

那时的时髦话通常有两种，一种自上而上传播，由政客拟定；另一种从底层社会发酵，为民众所笃信。“不说时髦话”有时可能意味着孤立无援，既遭受当政敌视，又面对民众冷眼，甚至成为社会公敌。

“九·一八”一周年时，胡适提出，北伐以来形成的新政府，华而不实，破而不立，已经在几年之间彻底堕落。傅斯年更犀利地抨击道：“国民党所存之革命性尚存几何，及国民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天下共知。”毫无疑问，这些言论都注定让他们被国民政府视作眼中钉。

他们创办《独立评论》是为了直面国难，探讨抗战对策，可吊诡的是，他们对抗战局面的分析，有时也会被粗暴地曲解为卖国。

丁文江从武器装备、经济实力、指挥人才、战前动员等角度比较分析，认为中日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暂时无力对阵，不主张冒进。在这个方面，蒋廷黻更有发言权，他仔细研究过清宫档案，鉴于甲午海战时清廷贸然宣战导致的后果，他指出：“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来对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几百个宣传员所能造的民气来对付一个经过五六十年的训练和组织的民族，这不是国粹八股，党八股，洋八股合而为一吗？”面对敌强我弱的时局，蒋廷黻认为，中国不得不暂时妥协，“我国目前最急最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有些人对苏联怀抱幻想，试图联合苏联来抵制日本，蒋廷黻同样忧心忡忡，大量证据让他相信，苏联不会对日作战，反而会通过妥协来缓解自身的压力，以便全力投入与德国的战争。1933年热河之战，日军势如破竹，翁文灏哀叹：“中国前几年对外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其结果是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完全打倒”，而他提出的方案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来牵制日本，尽管弱国无外交，他仍然认为，“遇有交涉必须尽情尽理的讨论，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的工具，务将国际关系纳之轨道之中”。胡适则一面呼吁“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最大最惨的牺牲”，一面又冷静地提醒国人“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些声音，显然都会被一些青年理解为卖国，他们嘲讽《独立评论》的社员们是“右派”，从前特务们要暗杀胡适，现在北大的学生竟然也在给老师的信中使用这样的落款——“将来杀你的人。”

让《独立评论》社员们忧虑的，不只是外患，他们还注意到社会内部的一些复杂的现象。胡适发现，一股文化复古的风气正在蔓延。朱自清则感觉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正变得越来越病态，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里，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时髦话，许多学生热衷于对比富人与穷人的生活，无论写什么题目，都会绕到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可惜说得又都是“人云亦云的门面话，像是那儿捡来似的。”蔡元培有一个朋友，也是前清翰林，在演讲台上讲了几句激进的话，竟引来无数掌声，为了博取更多的掌声，就不知不觉说得越来越激进。胡适不禁感叹，前清翰林以为自己可以引导民众，不料却被民众牵着走了。虽然只是个案，却也道出了那代人的精神困境——他们宁愿相信是自己的谆谆教诲引发了共鸣，却不愿承认自己的意志其实已被公众绑架。虚荣心如此骇人，一旦遭到驱使，再想继续恪守独立的立场与判断，就变得无比艰难。

《独立评论》的这种调性，注定有些曲高和寡。何况，时代已经不同了，他们无法再像“新文化运动”时那样轻松赢得年轻人的崇敬与响应。傅斯年在“五四”时代曾是学生领袖，年纪渐长之后却也不得不承认，时局催人，“中年失望，自甘于颓废；青年失望，极端的左倾”。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曾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只奋力扑火的鸚鵡，用翅膀沾上水滴，去浇灭山中的大火，然而，生活在一个日渐激进、缺乏共识的社会里，他们发现，或许还是做一只“讨厌的乌鸦”更合适些，至少能发出些不合时宜的声响。

这也就无怪乎有些朋友不赞成他们创办《独立评论》。《新青年》时代的故交周作人就劝胡适，与其办刊，不如讲学论学，不要天真地以为“青年是在我们一边”，可胡适不以为意，回应道：“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一个人的宗教……‘朋旧凋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

胡适当然也对青年失望过，但他又别无选择。他们生逢这样的时代，无法容忍腐败，效率低下，却也无法苟同于民间社会失控的激情。他们一面倡导自由民主，一面又被内忧外患胁迫，不得不做出妥协……生活在两股激流的夹缝里，随时都可能被撕得粉碎，但他们却还天真地希望合拢两极，引导人们走上理性之路。最终支撑他们的，或许就是一种近乎“宗教”的精神，明知对手强大，明知腹背受敌，明知不可为却仍要为之，为了他们所期望的国家复兴，为了给理想留下一线生机，他们只能忍受冷眼与诅咒，付出成倍的代价，努力试图为他人褪去枷锁，却在有意无意之间给自己背负起更沉重的枷锁。

三、诤友与诤臣

《独立评论》对政局的批判一直在升级，对政府的态度却不断摇摆。他们在杂志上持续刊文，反对独裁，然而落笔之际，内心又极为矛盾。他们固然对国民党极度失望，却又觉得，有政府总好过没有政府，尤其在这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领袖身上。丁文江接连写下《假如我是张学良》和《假如我是蒋介石》，为东北战局进言。1932年，翁文灏应邀到庐山为蒋介石讲学，讲解中国地质矿产分布，也畅谈时事。蒋介石多次敦请，翁文灏又引荐了胡适、丁文江、周炳琳等人，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为抗战做准备。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蒋介石听取了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的建议，亲赴保定督战，三人又见面蒋介石，“迭次谈话”，“讨论颇久”。与此同时，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注意，被两人先后约见，蒋介石更与他多次深谈。

1933年，汪精卫又向胡适抛出橄榄枝，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胡适回信婉拒，“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诤友诤臣”是胡适一生的写照，虽处江湖之间，却不忘庙堂之忧；既能避开庙堂的喧嚣纷扰，又可传递江湖的喑哑潮声。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舆论环境的开放，为胡适提供了做“诤友”的机会，但其间成效，却显然非他所愿。

尽管国家元首多次示好，《独立评论》并没有改变立场，也从未减少对当政的批评。1934年，熊十力撰文预言亡国的征兆越来越明显，“近日根本危机则莫如政治全失信用。略言其故，则欺骗，贪污，淫侈：是谓三大亡征。”又过了一年，陈之迈和罗隆基的批评继续升级，而针对政治改革，胡适则写道：“我们不期望一个堂堂的政党失信于全国，也不期望一个堂堂的政府两年来大吹大擂公开征求讨论经过几次修正的宪法草案居然变成儿戏。”面对内忧外患，他们仍然试图做一介“诤友”，尽管这理想越来越菲薄。

“民主”、“权利”、“自由”这些词汇，早在1860年代就由丁韪良（W.A.P.Martin）引入中国，从此被一代代知识分子不断反刍，又被当政反复标榜，可惜，在默契的权力交响中，它们却沦为杂音，越华丽便越孤独，越格格不入。

四、“用公心思考”

1933年年末，曾在淞沪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决定反蒋抗日，震惊全国。半个多月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刊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开篇即做定论，“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但他认为，民国以来的内战，一直让外交备受节制，转而给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他主张当务之急是维持政权统一，随即旁征博引，从英国到法国，从俄国到苏联，皆因上百年专制才造就强大的民族国家，因此，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是中国应做的选择。

继十年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知识界再度交锋。论战者大多都曾言辞激烈地批判当政，但是，从学理考量，并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他们还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当这个纠缠了中国人数十年的命题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比前人要自信得多。参与讨论的这一代人，大多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使得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却也正是因此，更加难以彼此说服。

对于蒋廷黻的主张，胡适不以为然，一周内接连撰文，甚至一直写到凌晨三点半才停笔。他想起20多年前《新民丛报》与《民报》围绕“开明专制”展开的论战，这个问题显然仍未解决。

此后数月数年间，论战断断续续，规模逐渐扩大，除了《独立评论》的社员胡适、丁文江、吴景超、张奚若、陈之迈、张忠绂等人之外，钱端升、陶孟和、陶希圣、张弘、常燕生、忧患生等人也加入了论战。这个命题让知识界魂牵梦萦，激烈论证，一再搁浅，又被反复探讨，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这些论战只是知识界思想分歧的冰山一角。针对许多具体问题，《独立评论》的社员们本身意见也并不一致。

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政论，傅斯年一怒之下又写信给他，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但在信中，傅斯年同时提到，虽然大家观点不同，但是不要影响私交。后来，胡适当面与他长谈，才澄清了这一误会。

1934年1月中下旬，胡适接连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反驳蒋廷黻和吴景超等人的观点，1月28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碰面，随即去蒋廷黻家喝茶，在这次聚会上，他们仍然无法彼此说服，但保持着平和的心态，蒋廷黻颇有些欣慰地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这正是《独立评论》社员们一向的态度，允许多元化的声音，同时保持理性与宽容之心，社员们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面对分歧，胡适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独立评论》发起的论战，无论是学理深度还是语言风格，都与“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不同，这不仅因为《独立评论》本身是一本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杂志，也不仅因为这一代人所接受的现代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更在于“用公心思考”。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因此才得以生发。依托一本刊物，以及松散的聚会，他们建构起一个学术共同体，甚至进而延展为公共平台。尽管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他们所谙熟的学术训练与知识，或许无法为一个迭变的时代提供切实可靠的答案，但是，至少他们愿意发起真正的“辩论”，让各种迥异的观点汇流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培养公共土壤，合力塑造出良性健康的社会。这正是《独立评论》社之于时代的意义。



◇ IV·学者从政 ◇



傅斯年



丁文江



蒋廷黻



翁文灏

一、丁文江之死

1936年年初，胡适抱病编辑、校对，通宵赶制了《独立评论》第188号，这是一期专号，“纪念丁文江先生”。

一个月前，丁文江到湖南谭家山勘察煤矿，仍然像年轻时在个旧时那样，不辞辛苦地下矿洞。这次旅途劳顿不堪，他感染了风寒，在旅馆休养时又不幸煤气中毒，而医生抢救他时，竟然连续做人工呼吸，压断了他的一根肋骨，刺破了胸膜，过了很多天才发现。1月5日，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去世，和梁启超一样，为庸医所误。

1月5日当天，胡适就得知了丁文江的死讯，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芒（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

往事如同一根根绳索捆绑着朋友们。

胡适想起刚刚相识时，丁文江担心他酗酒，又不便直接劝告，就从胡适的《尝试集》中摘选了几句诗，请梁启超题在一把扇子上，送给胡适，诗的意思就是劝他不要喝酒。胡适又想起，当初自己生病，丁文江就跑来劝他搬家，还悄悄承担了一部分房租。丁文江对朋友一直这样古道热肠。

翁文灏则记得，1934年自己出车祸，深受重伤，险些不治身亡。当时丁文江还在协和医院住院，得知消息，执意要赶去杭州探望。医生坚决不肯让他前往，他还是强撑病体，着手为翁文灏筹备后事，并做好准备，要收养翁文灏的幼子。正如丁文江的小兄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所描述的那样，“凡朋友的事，他（丁文江）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

在朋友们记忆中，丁文江一直是“丁大哥”——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朋友。

二、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去世前后，学者从政再度蔚然成风。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也在蒋介石的劝说下，同意以非国民党党员身份进入政府，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接受了翁文灏的邀请，前往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胡适当天的日记写得百感交集，“《独立》社员有三人入政府，虽是为国家尽义务，于《独立》却有大损失。”没想到，仅仅3天后，他遇到《独立评论》另一位社员周诒春，这才知道，原来周诒春也已经从政，就任实业部次长。

他们不愿置身事外，想要更直接地影响国家的进程。从前咄咄逼人的批判者，突然成为他们所批判的对象的座上宾。

各路人才的加入，让人们对这届行政院寄予厚望，《独立评论》誉之为“新姿态的行政院”。胡适心中却喜忧参半，既希望朋友们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为《独立评论》人才流失深感忧虑；既想让他们在政府中发力，改变现状，又担心他们会重蹈梁启超与丁文江的覆辙。正是在这百感交集之际，他得知了丁文江的死讯。

不久，几位南下的朋友就收到胡适的信，信中誊抄了丁文江的遗诗《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艳，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胡适写道：“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如今我们已回来, 你们请看分晓罢。——胡适

胡适在1932年1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近来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是应该做点事业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应该做点事业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应该做点事业的。”

短短5天之间，他接连写信提醒朋友们要保持独立精神，不要做“伴食”的官员。他说自己虽然反对读经，却一直钟爱《孝经》中的一章，“天子有铨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停下”。

他不仅不厌其烦地提醒朋友们要保持独立精神，还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做“伴食”的官员。他说自己虽然反对读经，却一直钟爱《孝经》中的一章，“天子有铨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停下”。

他不厌其烦地提到“诤友诤臣”这个词，这是他对独立精神的一种解释。故友丁文江的诗显然也让大家心有触动，蒋廷黻后来用“泉清”做了自己的笔名。

他不厌其烦地提到“诤友诤臣”这个词，这是他对独立精神的一种解释。故友丁文江的诗显然也让大家心有触动，蒋廷黻后来用“泉清”做了自己的笔名。

他不厌其烦地提到“诤友诤臣”这个词，这是他对独立精神的一种解释。故友丁文江的诗显然也让大家心有触动，蒋廷黻后来用“泉清”做了自己的笔名。

他不厌其烦地提到“诤友诤臣”这个词，这是他对独立精神的一种解释。故友丁文江的诗显然也让大家心有触动，蒋廷黻后来用“泉清”做了自己的笔名。

三、命运的歧路

在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社会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领域，《独立评论》社的多位社员既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人物，也是教育传承的先驱。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们都值壮年，正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然而，时代的骤变却不容他们置身事外，许多人最终偏离学术的方向，愈行愈远。

他们在整顿一个大学学院、扩展一家学术机构的时候，往往都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这让很多人相信，这种管理才能同样适用于政界。

他们在整顿一个大学学院、扩展一家学术机构的时候，往往都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这让很多人相信，这种管理才能同样适用于政界。

丁文江创办地质调查所，主持北大地质学，被陶孟和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胡适则盛赞他是“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杨铨遇刺后，丁文江曾继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再度为学界瞩目，在蔡元培看来，丁文江“是一位有办事才干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为在君先声，实为我国现代之罕见人物”。

翁文灏曾主持地质调查所长达17年，令地质调查所享誉世界，美国科学史家C.H.Peake撰文称赞地质调查所“在国际科学界有着应有的地位”，“它的研究为增值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出了真正的贡献”。胡适更是认为，翁文灏有做总统的潜力。1932年，胡适应《东方》杂志之邀书写新年梦想，一个梦想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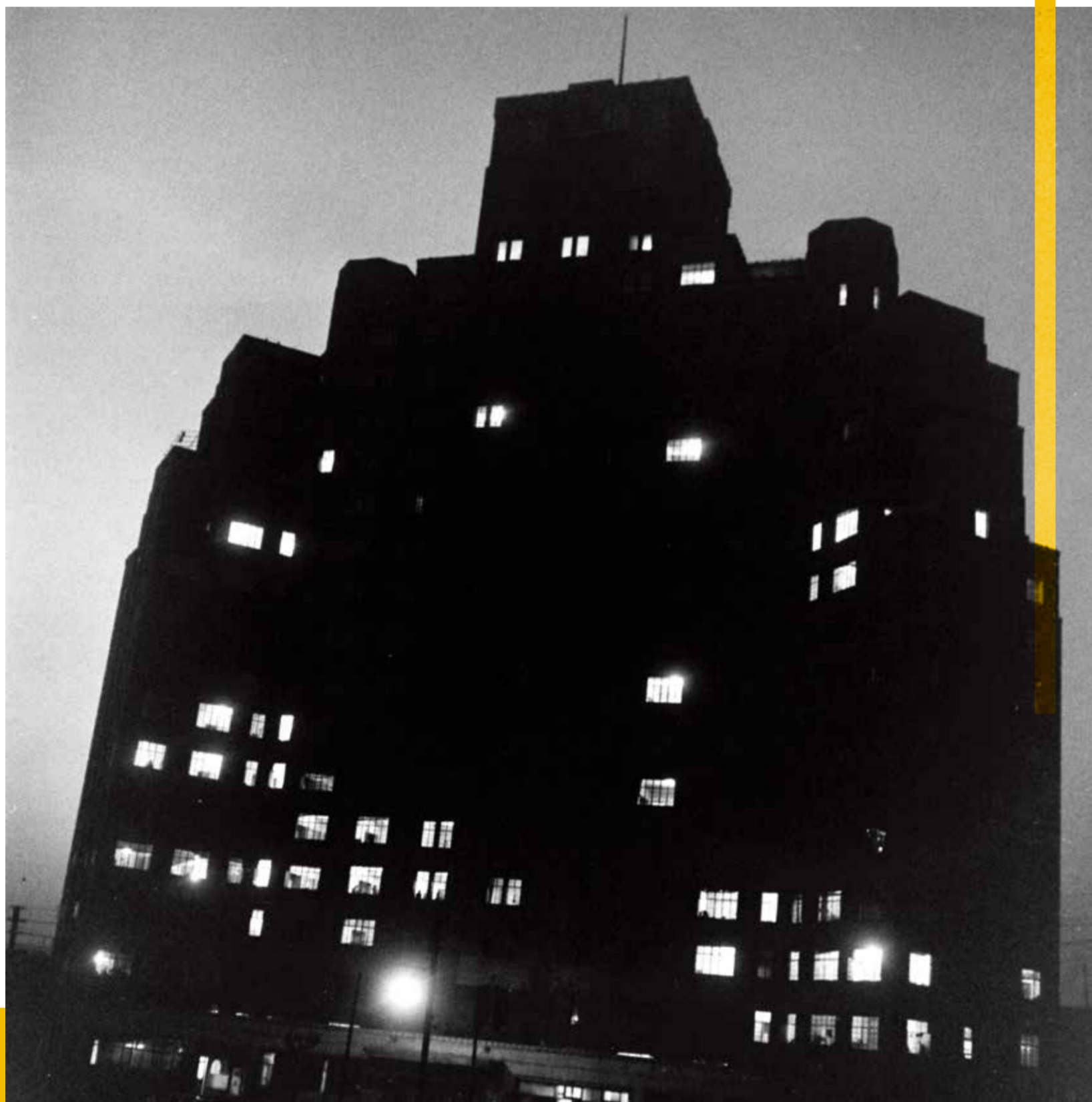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斯年在“五四”时代就是学生领袖，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济济，成就卓越，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他也被胡适视为“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上海大厦·摄影：Jack Birns

◇ V·“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

一、赴火

胡适来不及愤慨或感伤，就要踏上新的旅程。蒋介石敦请他前往美国斡旋，为抗战争取援助。他起初再三拒绝，不愿在国难当头时跑去国外，要求留在南京，与首都共存亡。经过朋友们反复劝告，他才终于答应出任中国驻美特使与驻美大使，向美国、欧洲政府与公众寻求支援。他拒绝了国民政府提供的3万美元宣传费，他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在未来长达5年的漫长环球旅程中，他演讲超过200次，其中有两个月，平均每天都有一场演讲。《独立评论》的社员们同样为了抗战四处奔波。

蒋廷黻北上，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苦苦游说斯大林政府支持中国抗日。即便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是坚信中国必能复兴，一定能向日本收复台湾，向英国收复香港。有一次与《独立评论》社的年轻社员陈之迈外出考察，蒋廷黻对他说，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他还期许陈之迈能担任“香港市长”。

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吴景超也追随翁文灏到经济部任职，为抗战提供物资支援，并担任重庆国际最高委员会参事。

他们并未放弃办刊的梦想。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陈之迈等人在重庆创办《新经济》，试图继承《独立评论》未竟的使命，为喧嚣的时代保留一些冷静的思考，但收效甚微。

周炳琳在教育部常务次长任上，促成北大、清华、南开南迁，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后，他脱离官场，任教于西南联大，一度代理校长职务。傅斯年和任鸿隽则随中央研究院南迁，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勉力推进学术研究，维系一线生机。傅斯年和周炳琳等人，都是蒋介石最为敬重的参议员。

胡适屡次劝说朋友们远离政治，但他们终究都要做赴火的飞蛾。“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终成黄粱一梦，胡适清楚地知道，“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不过，在给太太和朋友的信中，他一再表示，此次出山只是迫不得已，一旦战事结束，还是要回学校教书。一字一句，竟像他儿时读的小说里诸葛亮离开卧龙岗时对兄弟的叮嘱：“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其实，逃无可逃，亦归无所归。悲剧中的英雄，大抵如此。

二、星散

十几年过去了。

胡适在纽约东八十一街租住的简陋公寓，距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两条街。1950年代，每年有200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涌入大都会参观，咫尺之遥，胡适却几乎无暇踏足。他每日忙于买菜，陪太太打麻将，或者去更遥远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在图书馆里待一天，却也不是为了看书，而只是翻阅一些中文报纸。

美国《展望杂志》(Look Magazine)将他评为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世界伟人，然而，在年轻一代心中，他的名气已经远逊于林语堂。他终于不复当年那个一呼百应的精神领袖，家中依然访客如云，却几乎没有朋友。生活窘迫，一切从简，唯一讲究的只有日记簿，他只肯用美国Wilson Jones Company的Daily Reminder 389红色硬面精装日记簿，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

1956年3月12日，胡适又忙碌了几乎一个通宵。20多年前，通宵劳碌是为了编辑《独立评论》，此时则是为了纪念丁文江逝世20周年。凌晨3点，他为《丁文江的传记》写下最后一笔，历时4个月，终于兑现了“二十年前所许下的私愿”。就像当年丁文江为梁启超编写年谱一样，胡适也试图通过著书立传的方式来纪念故人，对抗时代的骤变。

他也再度想起他和丁文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的《独立评论》，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本“小册子”的诸多琐碎的数据，“《独立评论》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暮年的胡适依然怀着创办报刊的梦想，却有心无力，他写道，“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国内，有许多朋友劝我恢复《独立评论》。我说：‘不可能了，那个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无法子可以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其实他并非没有努力过，抗战胜利后，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曾召集北大、清华、南开的朋友们组成“独立时论社”，也筹备出版杂志，却终如昙花一现。一个时代逝去，不只是一群人的死别与生离，更是共识的破裂，理想的退场。

此时，在中国大陆，他的朋友和对手们已经对他的思想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全面批判。他在百感交集中翻阅着这些批判文章，却又无比担心留在大陆的故友与学生们的境况。

在台湾，他的处境同样微妙，有人攻击他，也有人试图借重他的声望，却根本不认同他的主张。《独立评论》的衣钵被《自由中国》承接下去，胡适亲自拟定了这本刊物的名称，并被冠名为发行人，但并未直接参与杂志运作。当《自由中国》遭到当局干涉时，他愤然辞职，“《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负责任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但他的这些呼声，不仅当局不满意，连《自由中国》的同仁们也不满意，前者认为太刺耳，后者则认为太温和，在后辈眼中，“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已沦为“不可一世的思想大师”。

近代中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做过思想界的精神领袖，这是无上荣耀，却更是莫大的风险。他们获得多少称誉，同时就可能遭到多少诋毁。从“榜样”到“标靶”，从众星拱月到众矢之的，不过一步之遥，只在覆手之间。胡适终究也要面对同样的命运。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的胡适，最终腹背受敌，又一次置身于两股激流之间，进退维谷，而此时，世间已无丁文江。

当年《独立评论》的朋友们，同样星散于世界各地，甚至生死殊途。

5年前，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蒋廷黻也流寓美国，已经做了十几年驻联合国代表，他退掉了政府给前任代表租赁的官邸，分期付款买了一幢小房子，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还一直试图推举胡适“组阁”，当然无法如愿。

和蒋廷黻不同，留在大陆的吴景超和周炳琳都已脱离政界多年。吴景超在1947年就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保持着一贯的勤奋，每天收集各种资料至少三千字，分门别类制成卡片。他加入了批判胡适的狂潮，仍被打成“右派”，但他还是在病榻上不断地为从前的学生证明清白——“一二·九运动”时，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曾代表学校营救学生们出狱，他不想让他们遭受诬告。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递交的三反情况简报上，毛泽东看到了周炳琳的名字。据说周炳琳做了多次检讨，都被认为不深刻，无法通过。毛泽东随即提笔批注，“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这或许是对旧日情谊的一种回应。1936年，毛泽东长征抵达延安时，周炳琳曾与几位教授一起寄过物资慰问。于是，周炳琳在第四次大会检讨之后，终于过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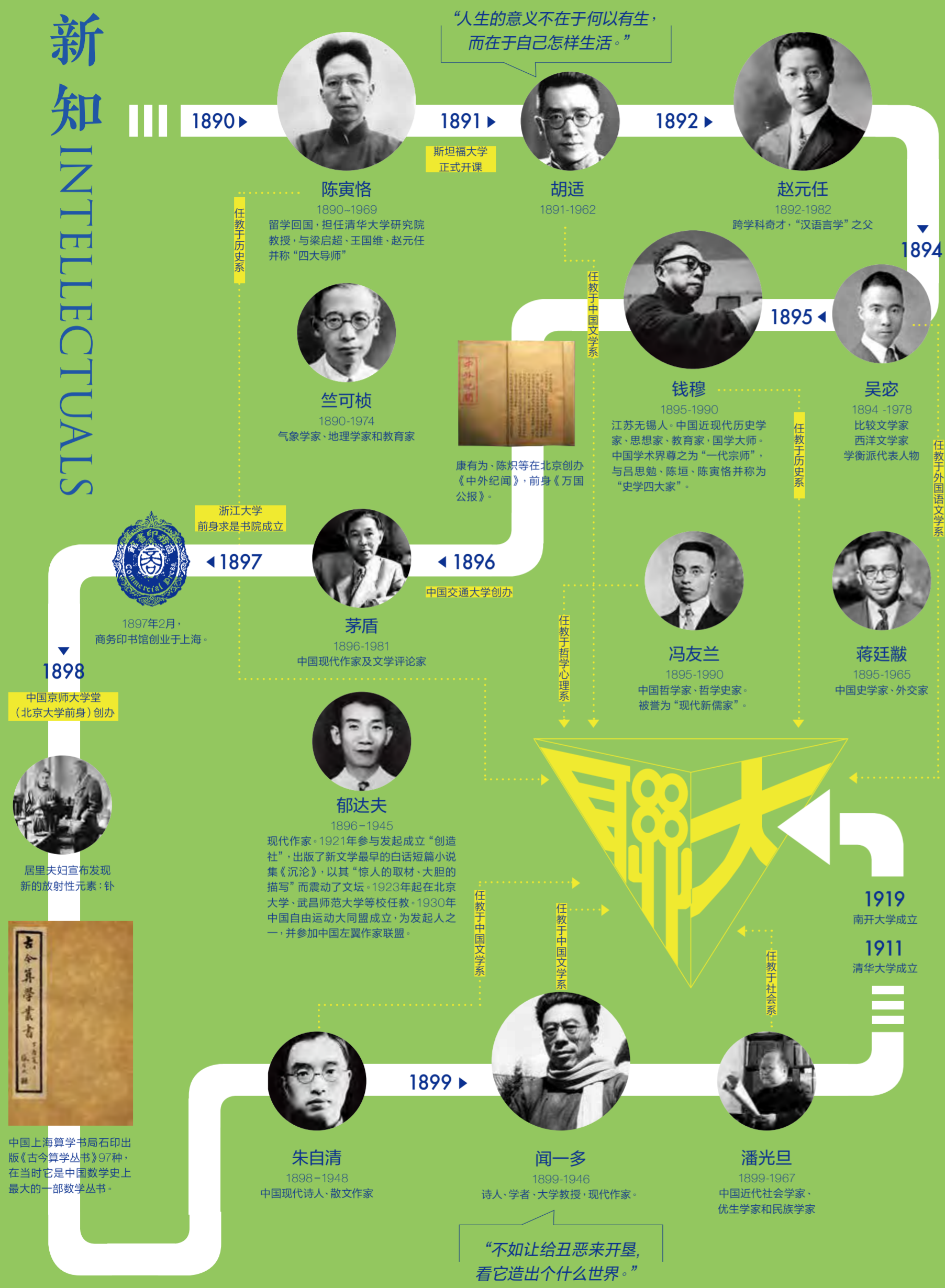
翁文灏则走了一条更为曲折的路，他因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被列为“战犯”，1949年取道香港，避居法国，两年后回到中国大陆。经过漫长的自我检讨，他终于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表示，“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曾经萦绕于《独立评论》社的笑语与争执，消散于历史深处。他们原本可以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最终却变成后辈眼中“《独立评论》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造化弄人，人亦自弄。他们在1960年代陆续去世，仿佛急于赶赴一场久违的聚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至死再未相见。



1942年·纽约 ©Fred Stein Archiv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新知 INTELLECTUALS



LISTEN TO HERSTORY

聆听她，张望历史

撰文：周亦鸣 图片提供：译林出版社 晏欢提供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并翻译

杨苡的口述是少数留存至今的那代人对于一段历史的见证。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聆听了她生动明快的、充满细节的讲述，把重复的、断续的叙事连成为连贯的、忠于她口吻的故事。百年来，她身边的亲朋旧友命运沉浮，是对人性的叹惋，也烛照了历史的宏大。



联大开学前杨苡在昆明大观楼

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杨苡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面对近十几年来家里的常客、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今年年初去世的百岁老人、文学翻译家杨苡生前聊起对昆明的回忆，仍不乏诗意浪漫的印象。那是1938年，各大机构往大后方迁移，19岁的杨苡离开在天津束缚着她的世家大族家庭，决意像她崇拜的巴金笔下的觉慧一样，寻找自己的天地。辗转经过上海、香港和海防，她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入学。从此，小我的生活被大历史席卷，直面战争与乱离所激发的民族自觉和智识的迸发。

从到达昆明到大轰炸之前这段时间，学业还未开始，没有后来的婚姻和孩子带来的负担，这是她的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好时光。

在天津，母亲强势，哥哥聪明得宠，姐姐自信好强，杨苡是相对弱势的。离开家，所有管束都没了，她浑身一股子兴奋劲。要怎么“像觉慧”，她心里却没谱，不顾沈从文劝她读书，成天看小说、唱歌、在麻布上绣她想出来的花样、写长信给巴金的哥哥李先生——惦念了一生的不明就里的情愫。她还拉一把亮闪闪的乐锯，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

一群原本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学会了淘米和做饭，也一起逛街、下馆子和看话剧，聊不完的心事和梦想，善解人意的杨苡也很容易交到交心的朋友。看电影和话剧结束，她尤其喜欢窜到后台去看演员和道具。她还给《战歌》投稿，加入了文协，开座谈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相比于在天津不被允许参加游行和集会，被中学同学称为“安静的小绵羊”的她感觉自己成了大人，变得自信。那样的日子仿佛可以过到永远。

过了一阵，杨苡的一个朋友决定离开昆明，去往延安。早在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所在的延安，那里随即成为掀起抗日浪潮和英雄事迹遍地的革命圣地，一代知识年轻源源不断地奔赴那里，寄予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时代的理想。

余斌认为，对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延安是对现实不满之后寄托的一种幻觉，但不一定要为之付出实际行动。正如杨苡所说：“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一概没想过。在中西（女中）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面写到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模模糊糊就是那样的地方，很浪漫，当然不是想象风景多优美，是向往一种单纯的生活，一个纯洁的世界……其实我也只是想起来觉得新奇、刺激，并没有认真地想过，延安更像是一个梦、一个念想，说一说过去了。”

9月28日是一个碧空如洗的晴天，西南联大的年轻人们说这天空“蓝得像马德里”。杨苡和朋友们正在合计去哪里玩，外面忽然就乱起来。大家都没跑，一个个不紧不慢地踱到天井里，三三两两站着聊天。这时候传来了很响的飞机的声音，有三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就从头顶上飞过去，几乎是同时，紧急警报响起来。就听到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前前后后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

西南联大就在轰炸中开学了。

学生们每天在简陋的校舍中穿梭，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大一国文”是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上这节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他们的课杨苡不大逃，毕竟是她崇拜的，陈梦家还长那么帅。女生逃得多的，是刘文典的课，也是她最不喜欢的，去了一次，把听课证交上去就完了。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她也不爱听。

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选了外文系作为专业。外文系给学生上课的老师就多了，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荃讲英国散文，陈嘉是耶鲁博士，讲莎士比亚，教室里坐不下，窗台上都坐着人。吴宓上过“欧洲文学史”，他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学生们笑了又笑。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更是对着空中大呼“Oh! Beatrice!”显然动了感情。

印象比较深的是陈福田的课，Western Novels，讲小说之外，他还开过一门Reading。不管讲小说还是上阅读课，他选的材料都是当代的东西，让他们读过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他英语说得漂亮，举手投足也比较洋气。他不只管自己讲，他会指定学生去读，还让写读书心得。杨苡比较习惯这样的讲课方式。她交作业，都被助教鼓励说可以走写作这条路。

余斌认为，杨苡的讲述拉近了那一代知名知识分子与我们的距离，让我们更生动地去想象，就像面对活人一样。“她的讲述全是私人化的，看似与‘史’无涉。杨先生的记忆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说，有‘八卦’的倾向。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她讲述的，都是她记忆中的事实，但此‘实’非彼‘实’——至少大多数人口中的‘史实’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事实的堆积。与宏大叙事相比，个体的琐碎叙事因其所见者‘小’似乎难沾‘历史’的边而被‘虚’化了。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杨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实’就‘虚’的，或者说，虽不‘避实’，然的确时常是‘就虚’。”

与上课相比，杨苡更喜欢课外的活动。联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她看见高原社的海报，说他们在哪个教室有活动，自己找上门去。高原社是联大学生成立的文学社团，有写诗的，有写散文的，以写诗的为多。他们出的壁报上面林蒲、穆旦、向长青的诗都是她喜欢的，就加入了。

开学后，学生们搬到了联大宿舍，一间房间要住十几个人，晚上一盏盏油灯亮起来。没想到，昆明冬天寒冷，没有暖气，学校伙食糟糕，学生们经常饥肠辘辘，而且还要斗臭虫，这下，集体想家的愁绪一触即发。

“但这也只是一时，多愁善感的年纪，忧愁也可以转化成诗意，也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昆明美丽的月色也像是来陪衬我们的乡愁的。”杨苡这样回顾那段时间，“我是很喜欢联大自由、宽松的氛围的，联大的学生有一股朝气，我在昆明的头两年，特别是头一年，也是那氛围的一部分。”

余斌认为，杨苡对于自己回忆的讲述，是出于自己当下的心境。“从常理来推，随着时间推移，日常生活的艰难是可以被淡忘的，记忆会过滤掉一些东西。她脱离大家族生活而获得的自由感会抵消掉很多负面的感受。另外，无论是‘五四’一代的精神，还是教会女中的教育，都会教导她轻视物质生活。”

也正是在学校里所习得的知识信念，成为一生的底色，化为抵御岁月洗礼的力量。余斌指出，杨苡这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单纯的，也许他们不能真正领悟或者面对复杂的现实，依靠在学校里打的底子，一些基本的理念在他们心里烙印很深，也就练就比较简单的应对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这个简单单纯也是她活这么大年纪，经历好多波折，能够维持住的一种生命状态，包括对世界的兴趣，都是如此。天真与经验是在她身上并存的，她身上绝对有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但眼神保持了清亮。”

直到生命的最后，杨苡都保持了年轻时的兴趣爱好，看书、看电视、听音乐和（让保姆）收拾屋子没停过。她经常有兴致了就给余斌打来一通电话，说哪个频道的节目好看，不等他回答，她又把电话挂了，眼睛盯着经典老片反复地看，什么都不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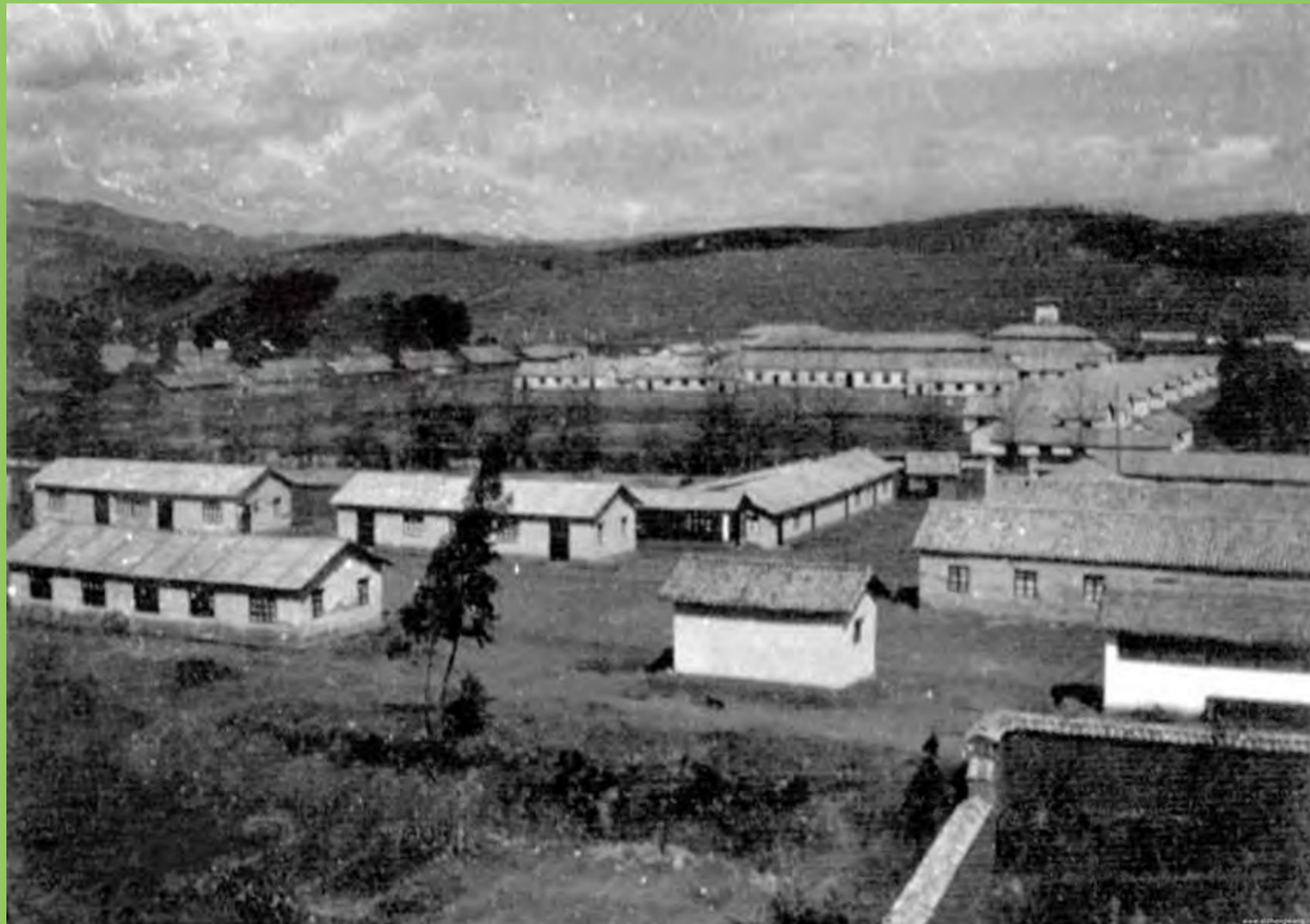
余斌却也在杨苡活跃明快的表达背后看到，她已经走入风烛残年。位于鼓楼二条巷的房子门口挂着她女婿写的“遵照医嘱，谢绝来访”，余斌却是个例外，随时可以去做客，坐在那个摆满书的客厅，待的时间根据杨苡的状态或长或短。她始终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在人前都会收拾打扮干净体面。如果没有准备好的状态被曝光，她会发脾气。在来客面前她侃侃而谈，兴奋时眉飞色舞，等客人走了，她又会有疲惫感，一人盹着的样子，会让人意识到老人家随时都有可能“随风而逝”。她有时也会流露出厌世的情绪，但总是很快会被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吸引，自然摆脱了消极的状态。

余斌记得，杨苡对他的最后一次口述，是在去年年底，他全程戴着N95口罩，杨苡却满不在乎，说不用害怕疫情，她讲起自己50年代初得过白喉，对于当时如何在家里隔离的细节，她都讲得清清楚楚。虽在衰退，她的记忆力仍然是惊人的。

为了让杨苡生前能尽快看到这本书《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出版，余斌把口述的时间卡在抗战胜利。杨苡担心书中的内容被挑剔，表示若有人“骂”，就冲她来，大有“你撤退，我掩护”的意思。心情大好的时候，她甚至想象可以和余斌一起去签名售书，——事实上因年老体衰，她已有多多年足不出户了。谈及杨苡如此充分的信任，余斌不禁有些动容。“我说过，我没有必要为杨先生谦虚。这本书非常难得，它的稀缺，它的不可复制来自她的记忆力，讲述的好多条件不像这本书这样能凑到一起。”是她的口述带领我们后人张望那一段历史。



上：联大学生战时上课的教室 下：在战时坚持学习的流亡中的大学生，正离开一间连窗户纸都没有的教室



联大的校舍

正是在学校里所习得的知识 and 信念，成为一生的底色，化为抵御岁月洗礼的力量。

杨苡这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单纯的，也许他们不能真正领悟或者面对复杂的现实，依靠在学校里打的底子，一些基本的理念在他们心里烙印很深，也就练就比较简单的应对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

《生活》：您做口述的有十几年，遇到什么困难？

余斌：一开始我没有想要做成一部口述的时候，就想得很简单，把她说的内容记下来。因为我原来做口述的初衷，就是觉她讲的很多事情很有趣，可以是很有意思的史料。她说什么记什么，也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完整的、很连贯的叙事，片段化的也可以。

困难是在我对这个口述的设想变化以后。我希望它像是完整连贯的口述，包括它应该是绝对口语的。讲述的跳跃性很大，是像聊天一样的，会省略很多内容，因为关系熟悉，好多东西觉得不需要解释，可能是破碎的、断续的，我要把它补足，从头到尾我要维持住口语的口吻。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还原到她原来的话，有一些缝隙，我必须把它填平，我要模拟她的语气和节奏。

《生活》：您说到杨苡先生讲述是出于她在那个当下的心境，那讲述中进入的叙事是否会有所不同？

余斌：其实她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到了某个阶段就定型了。变化的是记忆力下降，她说话的跳跃性更大，越到后来就越难形成完整的叙事，她讲那么一段，马上又插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一直是她的特征。她100岁以后和她90多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记忆力还是惊人。要说变化的话，不是在这方面她的什么态度，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新想法或判断。变化在于，100岁越往后，她愿意让讲述变成文字，面对公众的尺度越来越宽了。很多东西她早先觉得不能说，或者说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说不事，但是不能写出去。后来她同意公开了。

《生活》：您提到一些事情她可能讲了很多遍，把所有版本凑起来是一个最完整的版本，您作为口述者和记录者的身份是怎么处理？

余斌：我的身份比较暧昧，和这本书的性质有关。我肯定有一个身份是采访者，但是我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其实她不把我当采访者，她把我当一个聊天对象，因为彼此信任，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我和杨先生为口述实录有不少冲突的，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她是口述者，但实际上我们是商量的，我可以和她争辩，坚持我的意见，甚至有的时候两人都不高兴，我觉得杨先生应该听我的意见的，她不听。后来杨先生觉得有点委屈。她觉得自己没办法“赖账”，这是她讲的，但是她又觉得你怎么把这写出来。后来我还是尊重他的意见，特别小心。她最后已经跟我说，你爱怎么写怎么写，你说要留就留，她已经是这个态度了，但是我还是顾及到她的一些意愿。我自己也很感动，她确实是很信任我。

一方面我要保证叙述的流畅，杨先生她讲话他是跳跃的，好多重复，我整理这些内容，同时我又希望保留即兴的东西，即兴东西不在叙事的主线上，它旁逸斜出了一下子，很有意思，这也算是我对这种讲述的现场感的一种保留。

我希望有两种现场感，一个现场感是过去在联大时候，你好像回到过去，还有是她面对我讲的时候，我是希望这两种现场感可以互相生发，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生活》：那一代人他们的私人记忆是更有公共性的。

余斌：其实倒不是，有的时候当然是和他们个人的意愿有关，有的时候是被动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记忆涉及到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公共的生活和你个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绑定的。个体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在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是相等的，有的时候个人和时代的这种相关性要少得多。在一个比较和平或者比较所谓盛世，太平年月，你可以有桃花源，你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个人的空间会大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所谓历史无情常常就在这儿，所有的人都被卷进历史，个人的意愿不被顾及。所以他们那一代人的公共话语多一点，常常因为本身他们的生活和时代是绑定的，所以很自然的，历史会投影到他们的意识当中。

人人都讲政治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时代，因为大多数时候不需要有那么多人去关心政治，你就可以过自己希望的一种生活。杨先生的偶像是巴金，巴金体现的是“五四”以后的一个主流，就是启蒙。所以启蒙立场决定了文学一定是介入的，所以像巴金他们是主流，像张爱玲他们注定是支流。我觉得很难说文学到底是介入好还是不介入好。

不会有人怀疑乔治·奥威尔的意义，但是乔治·奥威尔是很讲政治的，我觉得问题在于你介入不介入是一回事，介入了它还能不能同时还是文学，这是关键。我觉得你都可以举出很伟大的作品来。文学和历史比起来，文学的主流是更关心普通人，个体，而历史还是宏大叙事的味道多一点。

做非虚构口述史，个人也常常指的是一个时代样本或者是一个切片。有一句话说时代不是他的背景，他就是时代本身。杨先生口述讲的好多全是小事，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野，一个镜头特写到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从人海中凸显出来，这是从宏大往个体去入手。纯个人化的视野，是我们顺着她的视线看出去，她带给我们对一个时代和历史的





南湖诗社的活动地点——蒙自南湖菘岛轩



今日的西南联大先锋书店落地南湖湖畔，摄影：王子凌

THE PHANTOM TRAVELERS OF SOUTHERN LAKE

南湖畔，幻想底乘客

撰文：刘小荻 编辑：陈爽

在战火中吟诗念书，今日回看，当初联大师生恰似搭乘了一趟“虚幻的列车”，漫步蒙自南湖畔，成为诗人穆旦口中“虚幻底乘客”。

朱自清刚到蒙自时常常步行。蒙自不大，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东西南北四门可在一小时内走遍。1938年4月底，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的师生抵达了这个边陲小城。因为昆明校舍不够，联大租借了蒙自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用作文法学院的上课和办公地。男学生和教员住在湖北岸的哥胥士洋行，女生住在城内一位绅士周伯斋的三层小楼里，又名“听风楼”。蒙自也成为西南联大的临时分校。

蒙自自古便是交通要塞。光绪十三年开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滇越铁路绕道而行，蒙自商业一蹶不振。久经荒芜、清静秀丽的蒙自却意外成了战乱中的世外桃源。

中文系学生周定一回忆，由宿舍步行去教室的路上，南湖在左。回来时，南湖在右：“大家整天在南湖岸边的这条小路上你来我往，波光柳影，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味”，而那时长江中下游两岸正炮火连天。

南湖是蒙自当地的一处胜景，本地人称“青草湖”。春季杨柳发芽，钱穆每日都去湖上茶亭中，移晷不厌。到了夏天，雨季来临，南湖上荷叶田田，钱穆称“乃成极佳散步圣地”，此景不禁让北下师生联想起北平的什刹海。陈寅恪先生更赋诗：“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联大学生们的生活几乎围绕着这片湖泊展开，而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也以南湖为名，即为“南湖诗社”。

南湖诗社是在烽火连天的战时里，时代激流中的一湾平静湖水，栖息着人文的精神和尊严。那年五月，文学院的教授朱自清和闻一多自诗社创立时受邀成为导师。而在两个月之前，闻一多刚刚结束了一段历时68天的文人“小长征”。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原北大中文系部分师生在蒙自南湖菘岛合影（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

这是一场流亡，却带有些学术上晶莹剔透的纯粹之心，沾着理想主义的雨露。

湘黔滇旅行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长沙，筹备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政府和军事统帅部所在的武汉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日军的侵略目标瞄向了武汉，也影响了长沙。日军飞机开始频繁出现在长沙的上空，这距离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过才1个月。局势恶化，只能再逃。

800多名学生们分三路入滇。一路走水路，大多是女生和教师及其家眷，他们经铁路至广州，再从香港乘船绕道越南海防，最后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另一路走陆路，从长沙乘火车出发，过镇南关到越南，从滇越铁路到昆明，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等教授和一批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选择了这条路线。最后一条路线，也是最为艰险的路线，闻一多、黄先钰、袁复礼等11名教授带领着200多名经济困难但身强体壮的男同学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

临行前，有人问起闻一多，“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师，为什么放着车船不坐，要跟我们一起遭这份罪呢？”，他答得坦荡，“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脚步，去触摸那些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洪流激进，在那些无风的夜晚，没有人真的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这个民族的命运将会驶向哪里。文人的信念只剩下忍耐战争屈辱和蛰伏等待胜利的决心。只要教育不亡。

在出发前，学校给每人分发了军装、绑腿、草鞋和油布伞，棉衣多用，天冷御寒，下雨成了雨衣，晚上铺开就是以地为席的铺盖。学生们轻装出发，行李限定在8公斤以内。经学校向国民政府请求，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护送师生西行入滇。三月初，大部队沿着沅江南行，学生们目睹了路边二三十枚日军空投下的“哑弹”。进入湘西地界，山多藏匪，所幸湖南省政府曾给湘西王打过招呼，师生相安无事。路过的百姓看到这群穿着军装，也不配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经常议论纷纷。

走远路废鞋，布鞋穿两天就被磨坏，草鞋扎脚，一天下来脚上生出十几个泡，学生就想出办法，新草鞋用水浸湿后，再找来石头敲打一遍，再穿上脚就舒适得多。抵达蒙自，身上衣物早已破烂不堪。旅行团成员、北大英文系的刘重德回忆：“个个经风雨，见世面，身强力壮，晒得像铁罗汉。后来人人脱一层皮，才又恢复书生原有的面貌……我们却仍然精神焕发，刻苦攻读。为什么？因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学成报国。”

实际上，走了这样一条辛苦路线的学生中，有很多有志于社会文化考察方向的。由几位教授作为指导老师，三三两两组成了诸如收集植物、矿物或是民间歌谣的考察组。哲学教育系三年级学生刘兆吉曾经在闻一多先生讲《诗经》的课上听到过先生说“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这让他起了在途中采集山歌民谣的念头，并请闻先生做他的导师。

最终刘兆吉总共采集了2000多首歌谣，整理选择了其中771首编成了《西南采风录》，并请闻先生写序。闻先生还记得当初那场关于“原始”和“野蛮”的争论，他在序言中留下了这句话：“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这是一场逃亡，却带有些学术上晶莹剔透的纯粹之心，沾着理想主义的雨露。

南湖诗社成立

1938年3月6日，“湘黔滇旅行团”到沅陵遇上了大雨降温。沅陵人情彪悍，多山鬼传说。也恰巧在这瑰丽《楚辞》里的神巫之地，西南联大的第一个诗社的成立被正式“搬上议程”。

那天的大雪隔绝了去路，大部队决定当晚留宿在沅陵一个年久失修的客栈里。天寒地冻，学生们买来炭火凑成一团取暖，头上还狼狈地盖着雨布遮雨。是夜里，两个年轻人（刘兆吉和向长清）鼓起勇气决定向闻一多先生正式提起想要创立诗社，出版诗刊的愿望，并请他担任导师。

在那个漏雨的客栈里，闻先生一床薄背盖着膝盖，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和两个年轻人席地而坐，闻先生自谦说，“这些年他‘改行’了，教古书（《诗经》、《楚辞》），不作新诗了。又说明他对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还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他的旧作《红烛》《死水》还好。”就着诗社和写诗的话题，闻一多和两人畅聊了半宿。自那之后，办诗社的事儿渐渐有了眉目，刘兆吉和向长清得到了老师鼓励，多次商议成立诗社的细节，准备到了昆明就具体实施。

从昆明最终抵达蒙自，已是春日渐暖的五月初。5月4日，蒙自分校开课。5月20日，南湖诗社成立，朱自清和闻一多作为导师，连同二十多个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正式成立了诗社，其中就有诗人穆旦和赵瑞蕻等人。

赵瑞蕻和穆旦在当时是同学和挚友，在联大昆明时期，更是同宿舍上下铺的室友。赵瑞蕻读柳无忌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和罗皑岚先生的“西洋小说”以及吴达元先生的“法语课”。穆旦则选读了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他们还一起去听叶公超先生的“大二英文”课。穆旦也爱哲学，着迷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而对于所有外文系学生来说，英国诗人燕卜苏William Empson所开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这两门课几乎是必听的课程，回忆起来，赵瑞蕻觉得燕卜苏对年轻穆旦的诗歌影响是深刻的。

穆旦对南湖诗社的活动始终抱着热情，他积极投稿，诗社里商量出刊和审稿的所有小会议几乎也都会出席。社员大会开过两次，闻一多和朱自清都在场，漫谈起诗歌创作是写新诗还是古诗的话题，两位导师也提供给了这些年轻学生们很多经验和学术上的帮助。

朱自清提到“新诗应有一定形式，有相宜的格律，要注重声调韵脚”，闻一多先生笑言自己有时还看看新诗，似有点儿瘾，夸学生们比自己当年写得要“高明”。南湖诗社没有真正的纸质出版物，成员们把创作的诗歌誊抄在墙报上，穆旦也常常帮助刘兆吉、向长清审阅稿件，张贴墙报。赵瑞蕪还记得穆旦的字秀气端正，每次誊抄诗歌，他必然是字字认真。

在战火中吟诗念书，今日回看，当初联大师生恰似搭乘了一趟“虚幻的列车”，漫步南湖畔，成为穆旦口中“虚幻底乘客”。

由于地理相对隔绝，战讯迟滞，这里的岁月难得清静。文史学系的王宏道回忆：“在作为校园的海关旧址里的树荫下，可以看见陈寅恪、汤用彤两先生不时相聚交谈，大概是在交换对哲学或佛学方面的意见。在网球场上，可以看到金岳霖、陈岱孙两先生在烈日下对打网球。潘光旦、陈序经两先生，有时一同坐‘滑竿’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和民族调查古迹名胜，或去搜集地方文献古籍。在联大蒙自分校朱自清先生讲授宋诗，金岳霖先生讲授逻辑，邵循正先生讲授西洋史学名著选读，浦江清先生讲授唐诗，王化成先生讲授国际法，都可任凭学生自由去听课。虽然各个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并不多，最少的只有两三个，最多的也不过一二十人，但图书室里百数十人既拥挤又肃静的景象，多少也反映了战时联大教学的一个侧面。”

当时的学生宿舍又是另一光景。在法学院学生李为扬的记忆里，课余时间大多在宿舍内进行，有人趴在床头写家书，有人蹲在地上洗衣服，有人玩扑克牌、下棋，“大家相处得亲密无间，反不觉得是在流亡之中。”

因蒙自分校的设立，南湖畔新添了几家安南（今越南）人开的咖啡馆，联大师生常聚集于此，尤其是外文系教授燕卜苏，他一面啜饮咖啡，一面拿起铅笔写诗。生活虽平静，可咖啡馆里并不太平。“咖啡馆中尝开京戏唱片，以娱宾客。每过门口，辄听见醉酒、坐宫、捉放诸片，声声刺我心弦。天涯地角，何处处迫我思念旧都耶，”浦薛凤忆。

由于通讯不便，战讯迟钝，有时这里的人们会突然收到来自远方的家书，“堪称是天降的奇迹”。朱自清先生每每与学生分享着这份喜悦，说，“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只要还有人收到，就意味着我们不会亡，抗战必胜！”

1938年6月的一天，历史哲学系教授浦薛凤正坐在哥胥士洋行楼上，疑闻枪炮声，原来是旧海关一棵百年白树突然倒地。是日无风，陈寅恪警觉是不祥征兆。不久，机场扩建的消息在联大师生中间引起骚动，蒙自分校坐落在机场旁，战时喧嚣已然逼近。1938年8月，空军学校在蒙自设立分校，文理学院的学生和教授们回撤昆明。蒙自作为西南联大分校的短暂历史结束了，南湖诗社的故事也戛然而止。

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诗社的成员们创作了百余首诗歌，南湖边的诗社，也成为当时才初出茅庐的穆旦和赵瑞蕪等人成长的重要据点。那年八月，穆旦写下了他的诗歌《园》，轻盈的诗歌洋溢着诗人早期创作的灵气，南湖诗社短暂存在的三个月，连同着西南联大在蒙自的那段传奇历史，如同穆旦诗中“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一样，一起留存在了南湖的岸边。

飞鸟降落

又到三月，蒙自还是那个自洽的边陲小城，街道不宽，街上车来人往，路两边满是多而杂的各式小店，也能见到身着不同少数民族服饰的当地人，只是那些在南湖边穿着联大校服的学生的身影早已融进历史的光晕里。

跨越85年，3000多里，南湖边的老钟楼下，新建了一间书店，店名先锋。先锋书店用“降落”来形容书店的建造——它像是一只美丽的飞鸟，终于翼然临水，找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

此次西南联大先锋书店邀请了著名建筑师张轲为其量身打造，书店本身脱胎于南湖之滨的墨脱酒馆，在设计改造中，张轲保留了场地的钟楼和部分砖房，并以当代性的建筑语言，重塑出一个崭新的当代人文空间。设计师充分利用了书店滨水的地理优势，将其设计成一个正在向湖面生长的混凝土回廊，与南湖水波的涟漪构成了美妙的互文，亦是对于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的一次视觉化呼应。

店里多是诗集和书写那段已然成为传奇的西南联大历史的书籍。透过长窗，能望见岸边朱自清曾见过的成行尤加利树。如果细看，湖边新种植了来自天南海北的热带观赏树，产于西印度群岛的黄花夹竹桃，来自非洲的火焰树，花开得朵朵滚烫，开着花的热闹乔木汇聚成了一片杂糅之地，像极了那个逝去的年代，也是天南海北的，从华夏大地四方聚集而来的学生们，教授们，挤满了这个本就不大的西南边陲小城。

书店后方有一座挺拔隽秀的钟楼，乃是由原有的灰砖钟塔翻建而成。建筑师大胆地在钟塔内部修建了连接书店与塔顶的旋转楼梯，观者可以由书店漫步而行，登上塔顶俯瞰整个蒙自城，回望这座湖光山色下的人文殿堂。当初联大师生们在南湖之畔操持起南湖诗社，邀请闻一多、朱自清作为导师，亦是想用新诗为中国求进步、开民智。先锋的伫立，将目光再次聚焦那个隐匿的地标，跟随大地的异乡者在南湖湖畔寻觅心中的那一方精神领地。



滇越铁路蒙自碧色寨特等车站

*那是个烽火连天任重道远的大时代，
也是人文理想，教育救国之歌最激昂，最醉人心神的时代。是大师云集，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时代。
在艰难卓绝的战时，培养出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大师的西南联大，
将文明和教育的火种薪火相传，照亮了战争阴云下的至暗时刻。*

行走中营造 WALKING THROUGH ARCHITECTURAL SPACES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丰子恺 (1898-1975)



吕彦直
(1894—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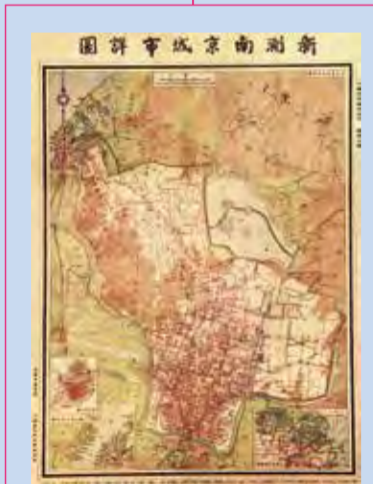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他设计、监造的南京中山陵和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型建筑组群，是中国近代建筑中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



NANKING



SHANGHAI



范文照
(1893-1979)

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第一位在上海造欧式建筑的华人。1921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士学位。留美期间接触了大量古典建筑，特别学习了巴黎美院的学院派设计方法。他在上海的设计作品有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北京大戏院（丽都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上海锦江青年会宾馆）、协发公寓、交通大学执信西斋等。

邬达克
(1893-1958)

匈牙利籍斯洛伐克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上海，7年后，32岁的他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从1918年到1947年，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市三女中等，邬达克在上海留下的建筑据说有124幢之多，这占据他建筑作品的90%之多，它们构成了今人所津津乐道的“老上海”。



凝固之乐 初试啼音

建筑师，和许多创作者一样，是游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那些人。他们一边在图纸之上挥洒灵感和热情，一边攀爬在现实的陡坡之上，寻求缝隙，呼吸、表达和创造。我们邀请的建筑师鲁坤面向整个历史风貌街区的修缮，热忱而谨慎，权衡各方的诉求，张唐以建筑建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锐意有为，改变人们的生活体验，李继津则逆着城市化的潮流扎根在广东塘口，塑造一片乡村。点点滴滴的营造和修缮，改变了一片土地的色彩和天际线，渗透入真实的生活。面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所涌现的需求和议题，这些90后建筑师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
为社会解决衣食住行三者中住的问题,
间接地说,是文化的纪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
所以你们的问题十分地繁难,你们的责任十分地重大。
——梁思成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弥合理想与现实, 寻找自由

撰文:三昧 编辑:周亦鸣 摄影:子央

在北京长大的作家北岛曾在散文集《城门开》中描述这样的画面:“瓦片连成了起伏的灰色波浪,直逼阴沉的天空,唯有电线和停在上方的鸟雀在其中点缀着。”然而,随着现代建筑的扩张,老北京的韵味逐渐隐没于时代的喧嚣之中。项目组从1901年和1903年拍摄的鼓楼至东直门大街,以及1915年鼓楼东望、1955年鼓楼南望这几张历史照片中寻找历史的踪迹。从发黄的黑白照片中,鲁坤见到平缓开阔的天际线和以胡同-四合院合瓦屋面为主的大片青灰色屋顶。在这里,集体记忆中的老北京找回了原本的样子。鲁坤说,自己仿佛回到了120年前的那个下午。



鲁坤在历史照片里看到了120年前的北京

一条老街该有的风貌

见到鲁坤时，她正从十字路口穿街而过。她身穿酒红色衬衫配咖色阔腿裤，拎着从古着店淘来的墨绿色单肩包，松弛而优雅。

我们约在鼓楼东侧见面。鼓楼建于明代，与北侧的钟楼统称为“钟鼓楼”，矗立于中轴线的最北端。往东走，就进入了鼓楼东大街西段，起头的店铺是“姚记炒肝”，曾因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光顾而出名。2021年3月，这条街道被纳入中轴线周边综合环境提升工程，鲁坤在其中担任建筑设计师。历经一年半，第一段街区（长250米左右）修缮结束，临街商铺重新开张。

这条街的传统之美是随处可见的。一块牌匾上方背后是更老的牌匾，那是一块七八十年代的水刷石，印有“晨光理发店”字样。一面青灰色的砖墙之中，混杂着几块老砖，那是项目组为了保持立面的整体性，从其他地方寻来的配件。一家酒店想要做成传统建筑风格，鲁坤设计了两块灰色的砖雕，嵌入二楼入口两侧，与红门、绿树相映成趣。

鲁坤和同事几乎穷尽手头可以搜寻的资料，希望有理有据地重构传统风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登上鼓楼或是任一店铺的露台，都能看到胡同交错成棋盘式的格局，低矮的屋顶连缀成一番独特的景象，俗称建筑的“第五立面”。在北京长大的作家北岛曾在散文集《城门开》中描述这样的画面：“瓦片连成了起伏的灰色波浪，直逼阴沉的天空，唯有电线和停在上方的鸟雀在其中点缀着。”

然而，随着现代建筑的扩张，老北京的韵味逐渐隐没于时代的喧嚣之中。登上鼓楼往下望，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一侧，突兀地立着成片的彩钢顶屋面，其形制、布局、材质、色彩都会影响到视野的通透性。这是由于私人改建时通常选择平屋顶、红色的水泥瓦、以蓝色为主的彩钢板，而非传统的合瓦屋面。不少建筑屋顶上置有杂物、棚架和电器设施等，布局凌乱，使得传统的肌理慢慢消失。

项目组从1901年和1903拍摄的鼓楼至东直门大街，以及1915年鼓楼东望、1955年鼓楼南望这几张历史照片中寻找历史的踪迹。从发黄的黑白照片中，鲁坤见到平缓开阔的天际线和以胡同-四合院合瓦屋面为主的大片青灰色屋顶。在这里，集体记忆中的老北京找回了原本的样子。鲁坤说，自己仿佛回到了120年前的那个下午。

一条老街该有的风貌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上，这里处于北京老城的核心位置，曾经商贾云集。建国后，虽然历经数次修缮治理，但由于环境整治思路单一，不少问题遗留下来。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居民曾被要求把所有的违章建筑用女儿墙遮挡。

2021年，项目组设计了“鼓楼传声计划”微信小程序，发放给商户和本地居民，以收集他们的改造意愿和想法。居民倾向于提升步行环境，增加休憩座椅；经营者倾向于重新设计店铺“脸面”、改造屋顶。一位商户直接写道，希望把店铺改装成欧式建筑。

鲁坤认为，建筑设计师应当以一种“上帝视角”去看待问题，平衡多方需求，而不偏袒于某一群体。千百年来，作为周礼营城思想的“后市”之地，内城里仅次于长安街的东西长街，鼓楼东大街是北京老城商业特色非常显著的一条街。在当下，这条街“能吃西餐、喝咖啡、看书、体验一场话剧”，才能“有逛头”。

休息日，游人挤满步道，年轻人衣着时尚，在网红店前停留打卡。鲁坤指着不同店铺的牌匾，介绍自己和同事“埋伏”在其中的心思。每一户的牌匾、挂檐板、墙上的雨水管、旗杆盒都是项目组重新设计的，鲁坤曾经将门牌设计修改出12个版本。一家古着店的卷帘门轨道被砌进墙体，从而将不甚美丽的卷帘门藏进了银白色的雨棚，店面更添优雅清爽。这些都构成了路人对于街道的第一印象，构成了“眼前的感觉”。

除了目之所及，手边与脚下的感觉也很重要。踩在拓宽之后的人行步道上，鲁坤说这里欢迎老人搬出凳子晒太阳，也欢迎孩子们撒欢，不必担心会有尖锐之物带来危险。对于鲁坤而言，原本抽象的“公共性”一词其实具体可感。优化公共设施、美化绿化景观、打造安全的路面，让空间变得更加共享、包容，即是公共性。

我们在街上慢慢走着，鲁坤总能跟街上的人聊上两句。你能感受到90后的她身上有种亲近感，碰见推着小车卖花的小朋友，鲁坤问这一天的成本价格和收入，面露顽皮。拍摄间隙，鲁坤找一位人力车夫搭讪，问他“一天能拉客多少位？”她看重附近，希望了解居民在这条街上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建立某种连接，从而为设计做好准备。

与居民沟通交流，也是城市更新中最难的部分。鲁坤分享了一件趣事：在改造崇雍大街时，设计师研究了北京古民居中民居院门的颜色，多以黑色为主。起初，很多居民更倾向于红红火火的铁红色而不愿意接受黑色，觉得晦气。他们便借助风水学的一套说法：“黑色主水，水又主财，所以如果选择了黑门，黑门会为大家带来财运。”最终居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说法，项目得到了顺利的推进。

寻找自己的乌托邦

2008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研学活动时，鲁坤被这座正在历经升级改造的都市震撼了。出租车载着还在读大学的她一路驶进二环，驶过西直门，看到鸟巢，繁华感扑面而来。她调侃自己当即想到“发愤图强”四个字。随后，2016年，鲁坤从美国雪城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继续在建筑领域深造的她留在了北京。几年前，鲁坤和丈夫在海淀区买了一套“老破小”，七十几平米，两人亲手改装。

留在美国或是定居北京，都是美好人生，但在体验上或许截然不同。鲁坤形容雪城大学里的自己被周边人的一声声“good job”滋养，乐观、积极的情绪感染着她。她说那时“总觉得只要愿意去做，梦想都可以实现”。回国则更多为了家人。作为当年唯一的建筑学应届生，鲁坤顺利入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这是一家行业顶尖的平台。



在各方诉求之间踌躇，鲁坤修缮了中轴线上的历史风貌



鲁坤来到北京继续自己的建筑师理想

理想化是诱人的，也是危险的。“建筑师习惯把自己朝着完美的方向引，总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亦或是“我的建筑一定要做到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不只是被否定，还有不可避免的资金问题，这是行业的常态。

像所有在此深耕的设计师一样，鲁坤也会怀疑：“这个行业到底值不值得我再继续坚持下去？”

但一个又一个新项目之中，似乎又在昭示着耀眼的可能性，理想散发出迷人的灵晕。

这令她调整心态，全心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

或许还存在第三种选项。研究生时代，有一门课程是跟随老师到欧洲各国参观学习建筑大师的作品。面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想象大师们也曾在此生活工作过，这种真实的空间体验感对鲁坤造成了很强的冲击力。鲁坤最喜欢的两个设计师是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斯卡帕和荷兰建筑师里特维尔德。卡洛·斯卡帕对建筑细节极致纯粹、强迫症式的考究让人赞叹，里特维尔德则在空间上高度复合立体，追求实用功能、结构简洁。她说：“对于大师的那种痴迷感就像追星一样，总是琢磨，觉得里面一定有他的某种巧思。”

刚回国的时候，鲁坤的内心还保留了留学时期的激情和闯劲。她曾计划到北京郊区，找一家木工厂，亲手打磨一组家具。她想复刻的第一件作品，便是里特维尔德的经典作品红蓝椅。但由于工作节奏快，最终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她的微信签名描述了某种与生活微妙的和解：“间歇性踌躇满志”。她说自己的潜台词是更多的时候想要放松、躺平。这种情绪，往往在一个项目出现瓶颈时找上自己。很多次，自认为满意的方案被否定、项目推进艰难，或是加班劳累，鲁坤的内心总是在“躺平”和“奋斗”中摇摆。不得不面对的矛盾是：通常，甲方更需要稳妥的设计方案，“不出错”是最优解。

鲁坤更喜欢的职业体验则是思考如何突破现有的建筑形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建筑形象和使用功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更有价值的体验，这件事让我兴奋”，在电话里，鲁坤尾音上扬，兴致勃勃地讲起几年前自己参与的烟台市区某条街道的更新项目。在功能上，鲁坤将单一体育功能改成复合性社区综合性游园，既可作为体育活动场所，也可以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等功能服务，满足全时全季全龄使用需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大胆的设计没有实施落地

理想化是诱人的，也是危险的。“建筑师习惯把自己朝着完美的方向引，总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亦或是“我的建筑一定要做到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不只是被否定，还有不可避免的资金问题，这是行业的常态。像所有在此深耕的设计师一样，鲁坤也会怀疑：“这个行业到底值不值得我再继续坚持下去？”但一个又一个新项目之中，似乎又在昭示着耀眼的可能性，理想散发出迷人的灵晕。这令她调整心态，全心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

对于建筑设计的热爱可能在幼时就已有萌芽。还是孩童时期的鲁坤便被身为规划师的父亲下班带回来的房屋平面图所吸引。那些长长短短的墨线，围构成一间间的房屋，在小小的脑袋里形成初步的空间概念。这种空间穿梭的想象力从鲁坤读中学的时候愈发的明显。高中填报志愿，鲁坤毫不犹豫的在志愿书上选择了“建筑学”这个既理性又艺术的专业。

在鲁坤的家中，现在还保存着自己中学时手绘的第一份房屋平面图。那是一套跃层住宅，面积有140平方米，虽然比例和尺度都非常失衡，但却承载着对于“理想家”的美好设想。这种空间穿梭的想象力从鲁坤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被唤醒了。相较于同龄人，她早早地萌发出自我意识，这得益于做城市规划师的父亲从小带回家的房屋平面图。

也是从中学时起，鲁坤就迷上一档日本家装改造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这是一档老牌节目，剧情为顶级建筑师改造素人住宅，在有限的空间里，提升居住质量。节目第一季的介绍语或许道出了其中的精神：“现实所居住的环境，难免有令人感到不满意的地方，然而或许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许是基于得过且过的心态，人们总是日复一日忍耐着生活在不满意的环境里，或是期盼着有朝一日能搬离此处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其实忍耐和逃离都是不必要的。”

鲁坤的一大爱好是打开房屋中介的app看户型图，这些户型图通常都是“老破小”。受时代局限，老房子的格局总是不尽如人意，无法满足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几年前，鲁坤开始关注北京的“老破小”。以一名建筑师的眼光看，“如何盘活老房子”，或许是这座城市即将面临的命题。

她常常以不同人群的眼光来想象改造的可能性。“5分钟快速改造”，她为自己设定一个角色：刚毕业的大学生、独居老人或是一家三口。随后，打开户型图，想象自己走在房子里，会看见怎样的需求，由此如何进行空间优化、升级。这五分钟里，她可以决定空间里的所有布局，让它舒适、灵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全能改造王”亲手画出了乌托邦的蓝图。从小家到大家的建筑蓝图，她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穿梭，逼近自由的所在。

设计首先应看重建筑功能，
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才力求造型完美。

——刘敦桢



BETTER LIFE 为社区创造 “更好的生活”

撰文：祁十一 编辑：周亦鸣 图片提供：一介

那或许也是许多人眼里的张唐。从东京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土生土长的成都，成立独立建筑师事务所“一介”，参与社区营造，做出了“一介·巷子里”等作品，在国内外拿了许多奖，成为小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

“一介·巷子里”拿过日本优良设计大赏“Good Design Award”2020奖，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评价它说，“它看起来很现代，但对我来说很成都，跟成都当地的氛围、人的放松状态很一致。”



生于1990年的张唐，去年底刚过了32岁生日。那张生日照片里，她坐在父母中间，面前是蛋糕上温暖的烛光，脸庞年轻清秀，眼神平和坚定，散发出灼灼光芒。你很容易从这张照片里得到一种感受：这是一个幸运的、有为的年轻人。

那或许也是许多人眼里的张唐。从东京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土生土长的成都，成立独立建筑师事务所“一介”，参与社区营造，做出了“一介·巷子里”等作品，在国内外拿了许多奖，成为小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一介·巷子里”拿过日本优良设计大赏“Good Design Award”2020奖，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评价它说，“它看起来很现代，但对我来说很成都，跟成都当地的氛围、人的放松状态很一致。”

而张唐在设计建造“一介·巷子里”时，不过才29岁。但若回顾她的求学与职业生涯，你又会讶异于她的早熟。她在很小的时候（初中毕业），就明确了自己要成为建筑设计师的志愿。大学开始留学日本学习建筑，又在研究生一年级时选择休学半年，回到成都和朋友合伙开了咖啡馆，一半咖啡、一半展览，从那时起就积累了设计、开店和社区营造的经验。所以当她在2018年接到玉林东路社区的委托，开始做“一介·巷子里”时，一切似乎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如今，她成为成都“90后”的一个代表，却感受复杂。“‘90后’的语境是青年人，非常年轻，但其实最早一批‘90后’也已经30多岁了。”她说，但某种程度上，中国的“90后”又确实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锋芒。

“我们是在2000年后经济发展时期长大的人，是很早一批沉迷网络的人，接触到非常国际化的东西，思维很开放，是随着中国加入到地球大家庭的步代，很友好地出去交朋友的姿态。”张唐说，“也有大量‘90后’留学回来创业，很有社会性、社会责任感，想要为社会做点事情。”

那也是张唐身上一个不可抹去的特点：“社会性”。她致力于让建筑设计与社会产生连接，参与到社区营造，一切目的是“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这就是属于“90后”女性建筑设计师张唐的故事。

扎根在社区的咖啡馆

张唐的成长，与东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小学一年级，她跟着留学的爸爸去日本生活了两年。在幼小的年龄，她有了“弱势”群体的初体验：身为语言不通的外国小孩，在异国他乡不可避免地感到边缘。她一直记得那时的害怕与忧虑，就连想去楼下小花园玩耍，也害怕在别人的国家里不受欢迎，直到黄昏无人时才偷偷跑去荡一会儿秋千，最后还是趁着没人来的时候跑回了家。

但也是家附近的社区，给了她最初的接纳与包容。她一直记得在小区一个房间里看动画片的场景，几位姐姐给大家放映，很多小朋友挤在一起，没人把她当外人。那时的她不懂什么是社区和社区服务，却逐渐融入日本，度过了一段开心与温暖的童年时光。

这也成为她设计“一介·巷子里”的一种理念来源。在设计之前，她和小伙伴在走访调研中得知玉林东路社区有200多名登记在册的残障人士，便决定将“残障友好”做为公共社区设计的切入点。顶部的白色膜结构，温暖的木头，敞亮的玻璃，方便残障人士行动的斜坡与盲文，开放的空间，“一介·巷子里”呈现出内外通透一体的感觉。没有隔绝与疏离，谁都可以在咖啡馆内外的木凳与椅子上坐下来，歇脚，下棋，摆龙门阵……有时候办讲座，主讲人在咖啡馆里面讲，听的人围满了里里外外，就连偶然经过的路人也可停下脚步听一会儿。这正是张唐在设计时就想要达到的初衷：没有将任何人阻挡在外的墙，所有人都是被接纳与包容的，思想和知识的传播也是没有阻隔的。

而在咖啡馆里面，一扇门连接着居委会的办事大厅，走进进去便会看见居民们正向社区工作人员咨询社保、户口等种种与居民切身相关的事宜，整个空间呈现出开放平等的气息。

咖啡馆对面的一排社区配套用房，2022年由一介参与空间更新设计，集合了社区、公益、商业的多功能空间。5月23日这天，成都利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办的展览“我的shi界——精神健康摄影展”便正在其中的社区影院进行，以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精神障碍，减轻社会污名和刻板印象”。

展览旁边是一介运营的“在街上”书店，店里摆放着青年艺术家与设计师的作品和新锐的独立出版物。那也是张唐和一介团队的一个理想：支持青年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表达，帮他们出售作品和周边。“实验性，不循规守矩，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张唐说，“未来还会增加西南地区的作品。”

“一介·巷子里”旁边的小广场，是一种典型的成都景象：小茶几、竹椅子摆放在树下的不同角落，大爷大妈们围坐一起，下象棋、五子棋、打扑克（象棋和五子棋均摆放在广场旁的柜子里，谁都可以取用），悠闲，放松。我也曾和朋友们在一个月夜拿着精酿啤酒，坐在这露天广场的竹椅上夜谈。那样惬意的时刻，你无法不对成都的社区场所营造深感赞叹。它是没有边界与门槛的，平等地向所有人敞开。

“成都的社区发展很先进，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而是因为社区要做这些，正好我们是这个专业，大家一起做成的而已。”张唐说。



社区应当是人们建立连结的地方



张唐回到故乡成都营造自己的建筑理想国

玉林二巷

玉林二巷是一个狭长的巷子，穿过整条巷子花不了五分钟。但若放慢脚步仔细观察，你会在这里看见成都甚至整个四川的生活与节奏。各式各样的蔬菜摊、水果摊、活鱼摊遍布路两边；时而有老奶奶把黄瓜、西红柿、辣椒分成几个小堆，告诉你“一元一堆”，哪怕你不买，她的脸上也挂着慈祥的笑容；若是下午不忙的时候，卖菜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摊子旁打麻将、打扑克，神情专注而投入，似乎除此之外生活没什么可操心的……

他们身后的房子，却显出年久而衰败的样子，水泥剥落，窗框老朽，玻璃露出大洞。这一片是2000年代初拆迁的产物，种种历史原因之下，拆了一半没拆完，成了外来人口聚集地。它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让玉林东路社区决心通过建立公共议事规则等方式去改变。张唐和“一介”也参与其中，他们既做建筑设计，也成立了一个多元参与的CACP小组，用策划、设计、运营的社区运营思维来运作。

张唐选择了巷子中门牌号为玉林东街19号院一个废弃的自行车棚。那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他们把它清理出来，正在重新改建成一个公共空间。在张唐的设想中，这个空间既可以做展览，也可以成为艺术家的一个窗口和驿站，让他们更接近在地的生活与人。

在改造过程中，一些流动便发生了。清理出来的旧家具，被一些居民拿走了；张唐和团队也生发了新的念头，找居民们收集破损的老旧家具，他们和志愿者进行改造和修缮。如今，一些小凳子、桌子在他们的想象和改造之下，变得更优美，摆放于一介书店，未来将放置于玉林二巷的公共空间，成为和空间有关联的、可持续使用的家具。

此后，他们还将参与更多。比如下水道堵塞、花坛荒废、街道和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张唐和团队都会参与提升，过程中也会和社区一起，帮助居民们形成议事规则，以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把这里变好，议事规则就逃脱不了，不然（做空间改造）就只是穿衣戴帽。”张唐说。

张唐如此深入地参与到社区营造，看上去就像超越了人们对于“建筑设计”的认知，但那才是她做建筑的初衷和深层目的：为了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年少时，她想学政治学，后来想学计算机，最后才确定为建筑设计。“它们的通性就是关心身边的生活，想要做些创造性的、改变世界的工作。而建筑只是一种手段，它更看得到、摸得到，不确定因素没有那么多。”张唐说。

但，“啥子是更好？我也不晓得，推进过程中就晓得了。”她用一口四川话说，“说得虚一点，就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所有事情的敬畏之心。尊重自己的生活，也尊重对方的生活。人和人之间都会有碰撞，有利益的冲突，有尊重才会协商，协商才会达成共识，事情才能往下走，才能把所有东西做好。”

这一切是她在过去几年建筑设计生涯得出的总结。她亦感恩能参与这些社区公共项目，毕竟那是她一直想做的事。“老小区的东西很有趣，我想跟这样复杂的环境打交道，所以2016年休学回成都开店、做展览就选择了老小区。我也想探讨一些公共议题，能接到像‘巷子里’、玉林二巷这样的项目就太好了。”她说。

做这样的公共项目，也让她有机会和更多人打交道，否则“你会非常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就是你的同学、朋友、同事，你的邻居你都不会打招呼，更不可能跑到社区跟人打交道”。做了“一介·巷子里”后，张唐和社区、居委会、NGO、NPO、周边居民都有了接触，时不时聊聊天，不再是那个有点内向的、“埋着头戴着耳机”走路的人。

在成都长大的她，曾经去了东京留学，在东京看到了一座亚洲大都市的复杂与繁荣，看到了日本人专注自己的兴趣爱好、形成了匠人精神，看到他们对新生活方式的追寻，和他们很强的社区意识。这些都对她造成影响，成为她学成归国后参与成都发展的实践。

这些年，她以自己的方式在这座城市留下痕迹，为成都的多元发展做出努力。今年五月，她曾在朋友圈写过一段话，那或许是她对成都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以前刚离开家出去（东京）读书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张靓颖唱的成都、MV拍的成都，每次都要哭，每次也要介绍给不同的朋友看，很自豪地说你看成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身处其中，觉得好片面好刻意，但其实它温暖着远在他乡的当时的自己。当时的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些是只言片语的成都，但一点点也好，我就想看到自己的家，为她这么能干而自豪，为可以分享给朋友们而感到开心，这样就可以了。”

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晏阳初



FROM VILLAGE TO THE WORLD 投身乡村，放眼世界

撰文：明星辰 编辑：周亦鸣 图片提供：李继津

从城市走向乡村，对于李继津来说，不仅来自一种土地的召唤，更像是一趟寻找故土的旅程。一次暑期实践让他偶然去到乡村，自此，他便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保护并改造当地的建筑，策划与乡民遥远回忆呼应的盛大节庆，与当地入朝夕共处。乡村或许离都市很远，但在他的心中，这片土地自始至终与我们所处的广阔世界紧密相连。



“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

从城市走向乡村，对于李继津来说，不仅来自一种土地的召唤，更像是一趟寻找故土的旅程。一次暑期实践让他偶然去到乡村，自此，他便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保护并改造当地的建筑，策划与乡民遥远回忆呼应的盛大节庆，与当地入朝夕共处。

乡村或许离都市很远，但在他的心中，这片土地自始至终与我们所身处的广阔世界紧密相连。

城市的孩子前往乡村

李继津出生并成长于深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城市的孩子。

在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城市化最为火热的年代。无数人从乡村涌进城市，大街上喧嚣拥挤的汽车，内地第一家麦当劳，从港台传来的流行乐与TVB剧，火车站里越来越多面目模糊、行李臃肿的异乡人——他们后来被统一称为“农民工”，成为而后中国城市建设最为底层却也坚实、庞大的力量……

或许因为早就习惯了了然城市生活的繁忙与拥挤，这让李继津从小就热爱乡村。他父辈老家来自潮汕乡间，每一次老家之旅途，都给他留下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夏日的稻田，清新的空气，傍晚突然响起的蛙鸣，在农田里忙碌耕种的农人……乡村的山水绝不是城市公园里刻意营造出的风光，它让人沉浸而非隔离，感受到自己本来就是身处其中的一份子。

也由此，当他在大学学习建筑期间，第一次听老师说在广东江门塘口镇仓东村开展的有关“开平碉楼”的建筑文化遗产保育调研——“仓东计划”，他毫不犹豫就参与进去，跟随老师对当地碉楼及建筑群落进行测绘和调研，并在毕业后留了下来。

开平碉楼，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这种中西合璧的民居，不仅在外观上集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比如古罗马的廊柱、巴洛克式的屋顶、伊斯兰圆顶和哥特尖顶，却在室内保存了原汁原味的中国风，各种中式家居、屏风隔断、供奉祖先的神龛……

2007年，“开平碉楼”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得通过，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由此诞生了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

一方面，奇异而混搭的碉楼调研极为吸引他。这些看来“奇葩”的建筑背后隐含着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自19世纪中期开始，大批华工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充当劳工，当思乡心切的人们回国后，会拿出自己在海外小心保存的、描绘了美国繁华都市的艳丽明信片或黑白照片，让村里的工匠按照图片上的样子，重新建造“新式”房子。

另一方面，村庄凋敝的现状同样让他感到震惊，“当时仓东村有51栋碉楼建筑，但整个村子只有两三户人家，其中六七个老人，一两个孩子，在村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年轻人。”

这让李继津意识到一件事，仅仅以学术调研的方式介入乡村是不够的，要让整个村落活起来，得想点新的办法。

重新热闹起来的乡下旧墟

仓东村所在的塘口镇，是李继津时常会去的地方。

在这里，乡民们时常会看到他穿着一双工装靴、将草帽反挂在脖子后骑着自行车到处乱晃。这个从城市里来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皮肤黝黑，看起来文文气气，却十分“自来熟”，喜欢和镇上各种人聊天。在与村民只言片语的闲聊中，他逐渐了解到塘口的历史。

这里曾在90年代初期十分兴旺，镇上有直达车通往深圳、广州；镇边已经荒废的码头曾是重要的交通聚集地，各类物资和建筑材料都通过当地河道运输而来；从前每逢“五、十”日必有“墟日”，人们常常会从偏远村落背着鸡、鸭、鹅、猪仔或者筐、箩、山草、甘蔗等各种农副产品来到镇上“赶墟”（赶集）……

但由于人口流失、华侨外迁等诸多复杂原因，曾经的热闹不复存在。直通车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小码头则被各种生活垃圾堆满，而热闹的“赶墟”彻底消失，乡下人学会网络购物，喧嚣而红火的线下贸易与乡民互动，只留存在老人的闲谈和回忆之中。

李继津发现塘口旧墟并没有那么多类似古碉楼这样的遗产保护建筑，绝大多数是八九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建起的水泥厂房，他想通过青年设计师的视角，以一种更有效、更实用的方式，介入到乡村建设之中。

2015年，他与“仓东计划”另一发起者——来自香港的邓华一起，启动了“塘口社区活化计划”，租下了塘口镇旧钟表厂、五金厂两个共2100平方米的建筑，将其改造成为青年社区空间和国际青年旅社。

已经倒闭的旧厂在他们的修缮下，变成了丰富而缤纷的社区空间，其中集展览、旅舍、剧场等多功能区域于一体，而红砖五金厂在被改造的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历史的印记，包括工厂原有的部分工具、机械和员工打卡处。

等他们改造完完两处庞大的空间后，却发现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村里徒然出现一两栋好看的建筑是不够的，建筑是为人而造的。如何吸引人们来乡村？这成为摆在他们面前极为现实也困难的课题。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从前村里老人闲谈时跟他提过的“赶墟”，当时热闹非凡、聚集了村里所有人的隆重“赶墟日”，不正是来自乡间的一场大型社交/交易/创意市集吗？



用建筑活化乡村



李继津觉得享受过乡村生活的自由，再也无法离开

“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候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

“18年的时候，创意市集早在国外和国内一些大城市很火，那时的塘口却没有这个概念，但乡村早就有墟日（赶集日），墟日不就是市集吗？当时我想，能不能以年轻人的视角在乡村创造一个新的‘墟日’？”

说干就干，他们将时间选在既传统却也应和时下的“七夕节”，李继津发动团队写公号发招募推送，招募城乡的年轻人参与市集；同时也努力在周边村落拉村民“入伙”，吸引他们作为摊主来市集“玩一玩”，实在凑不够的摊位就由团队成员顶上，增加互动打卡环节，发布图文推送，更重要的是，为此想出诗意而浪漫的名字——“七夕等墟”。

这场最初由村民口中闲谈而生发的乡村节日获得了始料未及的成功。无数本地人转发了这次活动，万人开车从外地来到塘口，其中有带着孩子的都市父母，有老家在此却留在外地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因碉楼名气慕名而来的外国友人……

过去很多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逐渐陷入沉默与寂寥的塘口旧墟，在2018年七夕前后，迎来了最为盛大而热闹的一次欢庆。李继津还记得一个当地朋友在当天发的一条朋友圈，他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塘口十多年来第一条出现在百度地图上的交通堵塞红线。”

乡村离城市很远，却离世界很近

“七夕等墟”活动由此连续举办了三年，规模逐步扩大。从一开始简单的摊位市集，扩展成包括“文创市集”、“祈愿节俗”、“艺术快闪”以及在地创生系列的“小岛诗歌美学之夜”等各种丰富的活动。

李继津发现，设计的思路不仅可以用来建房子，也可以运用到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去，“我以前总是觉得，要把设计的想法通过建筑的物理空间去呈现，但这种设计思维是否可以放到活动中、放到稻田里、放到具体的人身上，去呈现出另一种温暖的构筑。”

李继津将目光投向有关人的议题。

一直以来，他和团队都留意到镇上一名叫健叔的村民，他们常会看到憨态可掬、圆圆胖胖的健叔，开着一辆蓝色手扶车，载着一堆垃圾，缓缓地驶过社区空间，熟络起来才得知，健叔是社区的保洁员，会定时帮社区清理垃圾。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健叔消失了。再看到他时，他的蓝色手扶垃圾车换成了红色水果车，里面装满了香蕉。询问下才得知，社区保洁工作已被正规的环卫公司取代，健叔为了生计，不得不当起流动的水果摊贩。

“当时我们团队想要帮帮他，但确定不能直接给钱，这不是可持续的方法。于是结合健叔的一个形象，我们想根据他的形象创造一个IP。于是我们为他设计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香蕉叔”，还为这个名字想到一个谐音梗slogan：‘高手过蕉，一蕉成名’（高手过招，一招成名）。”

变身成“香蕉叔”的健叔瞬间成为社区的明星，当他骑着红色的水果车穿越小镇时，不少孩子会围在他身边主动去买香蕉，在市集上，他有了自己专属的摊位，甚至还有外国粉丝为了拿到健叔的签名，苦等他一个上午。

最可喜的变化来自健叔自身，他不再像从前一样邋遢沉闷，变得快乐而自信，以前总是赤膊上阵的他，参加市集的他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穿戴整齐、乐呵呵地招呼着来人。这给李继津和团队带来很大的信心，“通过我们的努力跟行动，让‘香蕉叔’的改造是积极有效的，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做社区营造、社区帮扶里面最想看到的结果。”

疫情的两三年里，虽然“七夕等墟”的活动不得不停下来，但关于社区的改造还在继续。

这几年，他们完成了“社区座椅”的微更新，雇佣本地的工匠参与建造，利用了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水刷石材质，回应这里曾有的传统建筑风格；也承担了“谢永宽故居”的改造工程，在保留了原有的青砖碉楼建筑的同时，衔接了创新却也融合的咖啡休闲区，让乡民可以在这里惬意地“吹水”闲聊，成为远近闻名的公共休闲区域……

“乡村离城市很远，却离世界很近”，这是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今再看，却有了另外的新意。

这句话最初诞生于他在纽约去到唐人街参观的时刻，“在深圳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离故乡很远，等我去纽约，去了最国际化的都市，唐人街上的建筑却让我想起塘口。那些侨胞建起的‘融合中西’的房子既出现在纽约，也涌现于塘口，这让我觉得，塘口作为著名侨乡，曾是十分国际化的地方，谁又能说，它未来不会再次如此呢？”



[people]